

# 目 录

## 1. 正文

1.1. 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中国.....	4
1.2. 不断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	4
1.3. 义和团革命起义.....	4
1.4. 爆发在德国占领下山东的起义运动.....	4
1.5. 义和团进军北京.....	5
1.6. 普鲁士军国主义自大的教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6
1.7.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6
1.8. 德国指挥下的帝国主义“讨伐战争”.....	7
1.9. 皇帝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 以及德国士兵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	7
1.10. 德国军队对他们的凶残行径感到自豪.....	10
1.11. “清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11
1.12. 《和平协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继续掠夺.....	11
1.13. 帝国主义合作揭开了不断强化的帝国主义对抗的序幕.....	12
1.14. 极具侵略性的德帝国主义.....	13

## 2. 资料来源.....14

## 3. 附录

3.1. 毛泽东：关于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历史.....	15
3.2. 胶州——德帝国主义的“样板殖民地”.....	17
3.3. 关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的两个重要方面.....	18
3.4. 大国沙文军事主义的煽动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	19
3.5. 列宁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发表于《火星报》创刊号.....	21
3.6. 关于革命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抗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政策的斗争.....	22

# 1900 年的德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

在一百年以前，德国帝国主义者在其皇帝威廉二世的指示下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民众自发的反抗欧洲和日本侵略者的义和团运动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德国帝国主义也想在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分一杯羹。他们企图向全世界证明，德国军队在掠夺和屠杀方面比起其他帝国主义者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 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中国

在历经了长达 400 年的殖民扩张后，全世界版图终于在 100 年前被几个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1871 年的德国虽然刚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并不是国民革命的结果，而是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官僚主义建立的，通过警察来控制的军事独裁政治”（马克思）的形式。对于德国这个已经来迟的强盗来说，瓜分中国这块大蛋糕无疑是他们对抗其他帝国列强，特别是英国的最理想途径。

皇帝的顾问，大校摩尔特克（Moltke）曾公开表示：“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诚实一点的话，促使我们去瓜分中国这块大蛋糕的真正动力其实是：贪念。我们想要在中国修筑铁路，开采矿山，传播欧洲文化，简要地说：就是捞上一笔。”（详见资料来源目录 14 号的 349 页，在后文一律简写为 14/349 页）

## 不断加剧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

导致 1900 年中国北部革命起义的最主要原因是：日益加剧的殖民帝国主义压迫。在这之前的 10 年中，各殖民帝国列强不断地扩大和强化了这种压迫。那些奉行侵略政策的传教士和为他们提供资金的铁路以及矿山资本家们在强化侵略措施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把侵略措施称为：“处罚措施”。

## 义和团革命起义

1899 年在中国山东省爆发了义和团武装起义，也称为“拳民”（即正义与和好之拳 请见 10/179 页和 18 209 页。因义和团的成员修炼中国拳术）。其主要成员为农民、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山东省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斗争对象是侵占中国领土的帝国主义强权及其帮凶。起义者杀死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帮凶，并且攻击德国军队。

## 爆发在德国占领区山东的起义运动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饥荒成为 1898 到 1899 年在山东南部爆发起义的导火索，在这场暴动中富有的外国传教站，特别是德国圣言会教会(Steyler)成为攻击的重要目标。此外，政府的腐败和欺诈更加恶化了广大受剥削群众和农村劳动人口的生活条件。义和团起义的主要目标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以及反对清政府释放那些有罪的贪官污吏和他们背后的德国支持者。针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德国殖民侵略者在天主教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的指示下，通过跟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来侵占土地、拆毁寺庙、兴建教堂，从参加起义的村庄收取“赔偿金”，强迫要求所有涉案村庄的绅士学者在公开场合卑躬道歉等措施，来“惩罚”所有涉案的村庄。

1899年初，义和团运动不断壮大起来，他们在鲁南地区捣毁正在修建的铁路，阻止为开采矿山进行的测量和钻探活动。连农民最担心的浇灌系统也遭到了更大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铁路和采矿公司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以对抗起义。为了准备进一步的军事治暴，德国军官汉勒曼（Hannemann）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巡查”。汉勒曼和他的随从们在鲁南地区的村庄里召集村民，然后向人群开枪扫射。几天之后，从柏林的帝国政府传达了如下的指示：

“巡查队可采取警察措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15/245页）

根据这项指示，德国士兵在汉勒曼的带领下在1899年4月2日把韩家树村的所有居民从房子里赶出来，然后开始全村搜索，最后放火烧村。40户农庄，大概300间房屋被大火摧毁。然而，巡查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继续前进，占领了日照市，掳人绑架，征收“罚款”。

1900年2月和5月在山东爆发了革命，但最后都遭到了血腥镇压。1900年5月，义和团的拳众在鲁北破坏铁路和电报。更重要的是，义和团运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当地群众的支持。义和团成员被邀请到村庄里进行非法聚会，向村民们传授拳术和计划准备攻击帝国主义军队。（15/246页到249页）

“灭洋”是义和团起义的主要旗号。这个口号在1900年旱灾期间散播到整个中国北方地区。义和团成功地在战斗中杀死约200名传教士和上千的汉奸。1900年5月，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当时的北京是全中国最大的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堡垒。帝国主义侵略者要求封建统治者和买办们剿灭义和团，中国封建统治者也害怕迅速壮大的义和团运动到最后会把斗争的矛头转向自己。

## 义和团进军北京

5月末，殖民侵略者在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之后派遣数百士兵保卫使馆区。一个月之后，20艘侵略军舰在大沽炮台聚集，并且有600名侵略军士兵在此登陆。义和团的拳民采取了各种办法破坏侵略军的后勤补给。6月10日，一支由英国海军上将西蒙尔（Seymour）统领的2000人侵略军在没有清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向北京进军。义和团向该侵略军发动了进攻，并重创该军。最后，侵略军不得不放弃本来的计划而撤退。在一场撤退掩护战中，甚至有人喊出了“德国人往前上”。这句话让很多德国军人甚至时至今日也引以为豪。

义和团战斗团在6月13日进入北京。在此几天之前，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局势：

“4000到5000名义和团拳匪已经前进到了离北京城很近的地方，他们已经占领了天津至北京以及大概30公里外的保定府至北京的铁路线，驱逐外籍雇员，一部分雇员受到身体伤害，火车站的建筑被烧毁。”（15/499页）

但是在使馆区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可以始终毫无限制地拥有军事力量。在使馆区的驻军可以毫无顾忌地杀害反抗者，因为他们被看作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在此之间已经有数百名反抗者被使馆区驻军杀害。6月16日，英美日联军包围了一座寺庙，仅仅在10分钟之内杀害了46名义和团成员。(15/499页)

6月17日，侵略军海军单位，在德军炮艇伊尔提斯号的参与下，攻占了大沽炮台。6月19日，清政府正式宣布与殖民侵略帝国断交，并在6月21日对外宣布正式开战。背地里清政府又对各国外国公使担保，将对他们采取保护措施。实际上，清政府是被迫对几个殖民侵略帝国宣战，以避免轰轰烈烈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锋芒，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等待时机再消灭革命反抗力量。(13/63页起)

### 普鲁士军国主义自大的教训——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

克林德(Ketteler)是众多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中在中国最不受欢迎的角色。他在北京是臭名昭著且狂妄自大的德国反动殖民者的代表。整个北京都知道他曾经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亲手殴打并囚禁中国少年。6月13日，克林德完全无视中方衙门总理的请求，拒绝释放被囚禁的中国少年。几天之后，该少年就被开枪射杀。德国人宣称他当时正试图逃跑。(11/66页)不仅如此，克林德和他“快活的手下们”还发明了一种残忍的“打鸽子”游戏。只是真正的靶子并不是鸽子，而是活生生的中国人。数十名北京居民被克林德和他的手下们从使馆区的围墙上开枪打死。克林德及其手下的谋杀行为在德国帝国国会遭到了社会民主党人士的强烈谴责。贝培尔(August Bebel)曾经揭示：克林德和他的士兵在6月14日从城墙上，向300到400米外和平集会的人群开枪扫射，至少有7名中国人被打死。(1900年11月10日，国会发言18/208页)狂妄自大的殖民情绪让克林德以为，绝不会有一个人中国人胆敢，更不用说能够成功地做到向他举枪瞄准。1900年6月20日，克林德在形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贸然从使馆区乘轿外出。而他不得不为他的狂妄付出代价：克林德被一名革命起义者一枪命中头部而毙命。在德国殖民者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在克林德被害处修建一座牌坊，为侵略者“涂垢雪侮”。1917年，中国加入一战对德宣战后，该牌坊才被拆迁。

### 义和团运动的失败

接下来，义和团拳民和清军开始持续地包围和攻击外国使馆区。围攻一直持续到8月14日。当时的殖民侵略者在使馆区内拥有4000军民和3000中国汉奸。在整个围攻期间，殖民者方只有66人死亡。清政府当权者之前的假宣战达到了他们预期的目的，义和团运动在短时间里受到了蒙骗。就这样，殖民侵略者以及与他们勾结的中国买办阶级、封建统治者阶级得以成功地实施他们的缓兵之计，他们赢得了关键的时间以聚集大量的兵力。

比如，国民历史学家肯定了武卫军最高统领荣禄的功绩。他们认为荣禄的缓兵之计避免了外国使馆区遭受严重的打击。(17/309页起)从7月16日到8月4日的临时停战协定也是一个骗局。清政府之后马上就向帝国主义列强妥协，宣布义和团为“拳匪”立即下令剿灭。(15/492页)在此期间，驻扎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军人数激增到20000人。此时的侵略军无论是在装备上还是在受训练的程度方面都远在清军和义和团之上。侵略军向有百万人口的

天津挺进，并在7月14日占领天津。8月14日北京沦陷。新一轮的大规模烧杀掳掠开始了。

## 德国指挥下的帝国主义“讨伐战争”

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军借克林德被杀的事件继续往中国增兵。7月3日，德国战舰法兰克福和维特兰号携带2500士兵从海路挺进。但是当他们抵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是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的8月29日。

喧闹的媒体争相报道了在北京发生的所谓的（针对外国人的）大屠杀。媒体的报道更加刺激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对北京采取武力干预的呼声和计划。英国的每日邮报更是在一篇名为《北京大屠杀》的文章中报道：7月6日到7日，北京使馆区的军民们在完全没有弹药的情况下坚守了下来，时局严峻到每个人都必须手握长剑的地步。其他的报纸借这个虚假消息继续添油加醋地刺激大国沙文主义以及种族主义的好战神经，对应所谓的“黄祸”（德皇威廉二世），他们甚至宣称：“男人先开枪打死他的女人和孩子然后再自杀。”（7/167页起）

帝国主义列强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的战争情绪，然后组成联军。联军拥有8万7千士兵和176艘战舰。除了德国的2万士兵外，还有来自法国、俄国、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士兵。

德国东亚远征军团的运兵船分成两批(1900年7月27日到8月4日以及8月31日到9月7日)从不莱梅港出发前往中国。在当时来说，那是德意志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军行动，帝国也想同时以此向其他帝国主义列强展示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次远征东亚一共耗费了1亿5千万马克。（11/221页）随着德国在整个殖民侵略军中的份量和影响力的迅速增加，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也得到了空前的膨胀，一本军事书籍曾这样记载：“德意志陆海军出现在遥远的地球另一端，这标志着德意志挤进世界强权大国之列的第一次展示，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81页）

同时迫于来自国内社会民主党革新力量的压力，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掩盖其真正的帝国殖民主义动机：“当时整个德意志政治就是以侵略为出发点，紧密地围绕着瓜分中国这个话题。”（4/103页）

## 皇帝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以及德国士兵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谋杀，抢劫，强奸

6月19日，还在德意志帝国向中国派遣第一批运兵船以及公使克林德被杀之前，皇帝威廉二世就向国务大臣冯·毕洛(von Bülow)详细地下达了德国“占领者”应该如何在中国首都执行血腥任务的命令：“必须大举进攻北京，将北京夷为平地……让北京的地面清除干净……这是一场亚洲向整个欧洲挑起的战斗。”（11/55页起）

7月21日，当德国远征军首批部队整装待发之际，威廉二世通过他著名的“匈奴演说”向全世界表明了德国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态度：“绝不要宽恕，不要俘虏……你们要让德国的威名在中国千年流传，从此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通过这篇充斥着大国沙文主义的激情演说，德国军队的士气很快地高涨起来。在运送德国士兵前往不莱梅港的火车上到处涂满了“仇恨是甜蜜的”以及“绝不宽恕”此类的军事标语、

德国帝国主义任命格拉夫·瓦德西（Graf Waldersee）为德军统帅。之后瓦德西就被承认为联军最高总司令。他曾在1870至1871年的战争中，在陆军元帅冯·莫特克的总参谋部从事，并从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中获取了足够的经验。

其实在瓦德西抵达之前，北京已经完全沦陷，瓦德西率领的以德军为主力的联军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了所谓的“惩罚性讨伐”。为了充分地执行皇帝威廉二世在“匈奴演说”中下达的指示：“让德意志的威名在中国的大地上远播”；为了让德国人成为最残忍、最贪婪的殖民者，德军在北京烧杀掳掠，强奸妇女。计划的75次“惩罚性讨伐”中最终有48次得到了执行。（11/224页）就连其他的殖民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自从德国军团来了以后，奸淫掳掠的规模和次数都得到了明显地增加和扩大。（19/257页）“惩罚性讨伐”一直持续到1901年5月。

四分之三北京居民都已逃亡外地。根据明确的指示士兵只允许抢劫三天。实际的情况却是，德军在北京的停留期间就从未曾停下来过。就连瓦德西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抢劫，同时不忘虚伪地说：“十分不幸的是，伴随着抢劫的进行，其他的暴行也难免会发生，比如奸淫妇女，谋杀，随意纵火等等。”（13/102页）任何被怀疑成义和团成员的人和义和团的支持者都会遭到毒打，然后被杀害。根据一个大使馆人员的陈诉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们是怎么剿灭反革命分子的：

“士兵们和本地人疯狂地扑向拳民们，数百拳民和他们的头头被打死。因为他们是为所有人近时带来不幸的罪魁祸首。”（17/135页）

市民们被抢劫，商店被洗劫，妇女被强奸，然后就放火烧房子。曾经是义和团运动重要据点的保定市在瓦德西的命令下被大面积地破坏。（2/52页）

德国士兵到底是怎么完全执行德皇的命令，是怎样进行他们的屠杀行为的，可以通过一封德国士兵的家书一目了然。这封在当时被称为“匈奴信件”的家书中的血腥记录被社会民主党代表在多份社会民主报纸作为批判的罪证，并将其公开发布。奥古斯特·贝培尔引用了其中的一封信：“你应该看看我们是怎么赢得第一次血战的，我们是怎么攻进城的。所有我们在路上遇见的人，不管是男人，女人，小孩都被我们屠宰掉。来听听，女人们是怎么喊叫的。但是皇帝陛下的命令：“绝不宽恕！”我们完全地效忠于我们的皇帝陛下，并将他的命令坚决地执行到底。”（6）

当地的居民被残忍地屠杀，然后他们的村庄被烧掉。一个德国士兵曾在他的信中提到北京附近一个叫良乡的地方，他这样写道：

“凡是被我们逮到的人，通通都被杀掉，连女人和小孩也不例外。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放火烧掉了整个城镇。9月11日是我到中国以来所经历的最为血腥的一天。在这天我更像一个屠夫而不是一个德国士兵。”（6）

另外一个士兵毫不隐瞒他的杀人乐趣：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攻打中国人是多么有趣的事情。所有人都被刀刺死和被枪打死，最后连整个农庄都被一把火烧毁。”（5）

东亚劳埃德——一个由德国资本家在上海创办的组织，曾在1901年2月8日公开发表了一份“惩罚性讨伐”参加者的报道，这份报道记录了很多次针对有义和团活

动和支持过义和团运动地区的老百姓的“惩罚性讨伐”中的一次。基于其中的一个描述可以看出，德国军国主义对残暴有很多的热衷：

“在紧挨着又高又陡的墙的地方挖开了5个大坑。罪犯就站在齐腰深的坑里……起先站了3个人在那些坑里，士兵们开枪射击，那些罪犯连抖都没抖一下就栽进了坑里，然后又有另外5个人站在那些坑里。就这样，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枪毙了很多中国人……我只能说，在所有我们所参加过的枪决中，我们不但没有一丝的同情和怜悯，而是带着一种残忍的快感去观看。唯一让我们觉得难过的是，那些畜生可以这么快的死去，然后就再也没有畜生可供我们枪毙了。”（12/32页起）

说到剿灭义和团就不得不提一下少将霍夫勒。他和他的1700名士兵在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夺下了离北京15里远的良乡，然后就“惩罚了所有的拳民”，换句话说：杀害了所有的拳民。在离北京18里远的地方，德国军队和英美日军队继续进行着他们的屠杀。他们摧毁了2座寺庙，据说那里是义和团的总指挥部。（11/261页）

德国士兵的凶残简直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他们甚至在死刑中用切草机代替断头台。在中校撒尔萨的指挥下，义和团的“三头目”在永宁乡被捕。在处死他们之后，撒尔萨还强逼永宁乡缴纳了5000两（折合1万5000马克）的罚银。

“当刽子手把罪犯们提出来的时候，他的助手已经把切草机扛在了肩上。他们在这之前已经测试了很多次，一致认为切草机完全可以代替断头台执行死刑的工作。在这个刑具的后面站着三个罪犯，他们的身体都被牢牢的捆着，连他们的辫子也被绑在一起。刑场就位于紧靠着城门的地方。第一个拳匪毫无反抗的就被架上了切草机，他的头被按在切草机的木板上，紧贴着刀锋。然而刽子手的行刑计划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算他多次按下满是缺口的切刀，也不能将犯人的头完全斩下，直到犯人挣脱按住他的人，还站起来跑出了几步远。再一次的尝试也没有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中校撒尔萨决定终止这场惊人的闹剧……几枪就结束了当时正躺在地上半连着头囚的痛苦。”（4/216页起）

义和团拳民的那种就算走上断头台也誓死不屈的精神也让德国军人感到深深的折服。“没有一个人因为即将受死而变节，根据我们的观察来看，中国人都是带着一种让人吃惊的平静去面对死刑，大概是因为他们坚信，他们是为了美好的事物而牺牲的。”（4/263页）

为了达到恐吓的作用，我们树立了一些“典型”：

“在三名罪犯被处斩以后，我们根据中国人的法律习惯，把他们的头挂在高高的木桩之上，他们的身体就躺在下面的棺材里。为了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他们的尸体在军队的监管下就这样摆了6个小时。”（4/264页）

当他们的军队遭遇抵抗时，他们就开始了血腥的报复：

„在离安亭火车站东北方向1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城，根据后来的描述，当侵略军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发现城墙和城门都没有人看守，但是当地居民的行为却是高度令人怀疑。几乎在每家都可以找到拳民的服装、红色的佩带、和大量的武器，从弓箭到新式曼利彻尔火枪。房屋都被当地居民层层围住，在收缴的过程中发生了激烈

的冲突。当少尉冯·库梅尔 (von Kummer) 收到因为小镇暴力反抗，将会用炮兵清洗小镇的命令时，因载着大量收缴而来的义和团武器以及带着副马难以前行的骑兵部队遭受了人数众多的当地居民的极大压制，以至于由库梅尔亲自率领组成的突围部队费了相当大的力气，不停地用卡宾枪开火才得以冲出城门。当然小镇的居民为他们的反抗行为付出了代价，不多久整个小镇就被炮弹摧毁。“（4/324 页）

由传教士开始的摧毁寺庙活动，现在又由德国军队继续了下去。有这样一篇关于小城保定的报道：“那些曾经被拳民用作集会和屠戮场所的寺庙，现在都变成了灰烬。”（4/262 页）6 间寺庙和城门建筑都被大火吞灭。除此之外，地方官必须缴纳 10 万两（约合 30 万马克）的罚银。“城市最高长官以所有官员自己的财产担保，罚银在一年以内如额上交（12 月 1 日）。”

1901 年 5 月，在所有义和团组织被剿灭或者解散了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德国侵略军为了结束“惩罚性讨伐”发动了一次针对张家口口的“德国行动”。这次军事行动把侵略者的血腥屠杀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次军事行动中有数百人惨遭屠杀。（15/492 页）

在北京，德法帝国主义侵略者将价值连城的数米高的铜制天文仪器从天文台洗劫一空。在两个强盗对分赃的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德国人在他们的那一份里分到了浑天仪。德国人把浑天仪用轮船运回了德国，安放在波茨坦的无忧宫展览。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代表对此事相当不满，还向德国的最高指挥官发表了一份抗议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在帝国国会上要求政府必须立即用自己的钱将抢劫而来的天文仪器物归原主。1902 年，当法国人将他们抢劫得来的部分交还给中国政府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士再一次在一份决议中重申了归还的要求。直到德国人一战战败之后，凡尔赛条约第 131 款才规定德国政府必须将所有抢劫所得在 12 个月以内物归原主。（11/259 页）

## 德国军队对他们的凶残行径感到自豪

陆军元帅瓦德西在 1900 年 9 月 22 日一封写给德皇的关于“匈奴演说”执行情况的报告信中大肆鼓吹德国军魂：“我们的军队经历了最激烈的战斗，这些事迹将会被世人永记于心。在战斗中被杀死的中国人不可胜数。所有的德军战士谱写了新的军魂……”（4/265 页）

从“匈奴演说”的角度来说，德军所有残忍的，肆无忌惮的屠杀以及报复行动的都是正确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什么是强权了，当一只脚狠狠的踏在他脖子上的时候，他也只有恭敬地拜倒在这只脚之下。”（4/263 页）

面对国际舆论愤怒的指责和批评，瓦德西也用他完全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腔调回应道：“如果说我没来(中国)的话，到现在都还有敌对武装势力存在离北京 3 里远的区域里，中国人会大声地嘲笑我们。只有采取最严厉最残忍的手段才能真正地制服中国人。”（16/66 页）这段话浓缩了德国军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之后二战中的纳粹法西斯思想也建立在这种军国主义思想之上，这种思想无处不在，在被占领国，在集中营，在毁灭营。



## “清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没有一个准确的统计，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在战事中遇害。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至少有数万中国人被谋杀和屠杀。（10/187页）美国将军夏福(Chaffee)曾经对一个记者讲过一些关于屠杀中国平民规模的细节：

„每杀一个拳民，就有15个无辜的苦力和农民也被杀害，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无意被杀的妇女和儿童“。（17/264页）

就连德军最高统帅瓦德西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如果要算的话，肯定是十分巨大的。”（13/101页）

当时，德国军国主义者十分坦白地报道了在中国不可计数的战争受害者，因为他们想在全世界面前展示，他们是最残酷的殖民者：

“中国人在每场战斗中的损失都是巨大的，他们的尸体常常在战场上堆积如山。”（4/239页）

奥古斯特·贝培尔(Bebel)曾经在国会上猛烈地抨击了德国士兵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谋杀罪行，并且对德国军国主义者进行了如下的刻画：

“.....这种野蛮行径，就算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也从未出现过。”（1900年11月19日，节选自3/556页）

中国北部，特别是首都北京和一些重要的大城市都在局部上遭到了彻底的摧毁和洗劫。不可计数的农庄在被掠夺一空之后，就被付之一炬。街道、桥梁、铁路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 《和平协定》导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继续掠夺

大量的破坏、战利品、和掠夺在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和平协定”中根本没有被考虑在内。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必须在40年的时间内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4亿5千万两（大概是13.亿5千万马克）。如果算上每年百分之4的利息的话，清政府实际上必须支付比这个数目多出一倍都不止的金额，最后实际要缴纳的数目是982238150两（大概是30亿马克）。德国侵略者可以分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说有接近6亿马克的战利收入。1917年，在一战中，德意志帝国不得不将这笔战争赔款一笔勾销。中国政府在向德国宣战以后也停止了赔款。

根据《辛丑条约》中国必须保证拆除包括大沽炮台在内的所有有碍从海岸到北京通道的军事设施（第8款）。直到1902年，所有的这些军事设施都已经从地面上清除。中国政府禁止进口武器，必须在天津和北京之间开放12个地方供外国军队驻扎使用。通过这一系列条约帝国主义列强为以后取得了军事上的有利地位。

为了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内陆，改善军事后勤补给，帝国主义侵略者下令开辟两条内河航运以供自己的炮舰使用（白河，今海河；以及黄浦）。而这笔巨款须由政府承担，事实上是整个中国大众必须承担这笔巨款。而外国公司又可以从中赚取大量的金钱（在以后的20年中，每年白河耗费6万两，黄浦每年46万两）。俄国占据

满洲并宣称将满洲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此外《辛丑条约》规定了百分之五的进口税以及提高关税。

为了保证对中国的剥削能够尽可能的不受干扰地进行下去，帝国主义侵略者此时最关心的除了在中国的经济渗透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剿灭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要求“惩办有罪的中国人”，结果有很多人因此被判了死刑。胁迫清政府承诺镇压反帝斗争。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的组织，违者处死。

在义和团运动之前和过程中，所有容忍、或者甚至支持过的各省官员一律查办。各省官员对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反帝运动和抵触《辛丑条约》的行为负责。在帝国主义侵略者获得战争胜利之后不久，清政府便由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前文曾提到）就执行了禁令和惩罚（枪毙），革命起义力量遭到了剿灭。尽管地方和地区性的义和团运动都是由农民和雇佣农领导的，但是帝国主义者始终坚信义和团运动的背后一定由有才智的人，由所谓的“文人”策划组织。在所有发生过反帝斗争的45个城镇停止文武等各级考试5年。这样可以避免在这些城市里有参加和支持反帝斗争的新成员从政。德国帝国主义者曾经解释过他们的目的，就是：

“通过一种道德的羞辱来强化对亚洲人物质的惩罚。”（14/351页）

中国的反帝运动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这个事件也许对德国人的伤害太深了，德国政府除了要求中国政府为克林德修建牌坊之外，还要求公开处死射杀恩海。他已经在1900年末的时候被德国指挥官下令处死。（7/130页）清政府还要派遣一名亲王到柏林，在德皇面前代表清政府对射杀克林德一事表示“惋惜之意”。皇帝的弟弟醇亲王亲自来到柏林，受德皇的召见后去宣读清政府的“惋惜之意”。就算他极其丢脸地跪倒在德皇的面前磕头认罪，也不能完全地让德国殖民者满意。（14/351页）

## 帝国主义合作揭开了不断强化的帝国主义对抗的序幕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崛起，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中国这个摆在自家门口的势力范围。在日本人施加的压力面前，德国人开始慢慢的无法保持住自己在中国的殖民地势力了。一战爆发后，日本在1914年8月向德国宣战。随后日本即派出65000人的军队进攻仅有4000士兵的德军驻地。在经过9天的交战后，德军海军上校梅耶瓦尔德克在1914年11月无条件、无赔偿要求地将“德国租界”转交给日本。根据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德国必须承认在中国的战败。所有被德国占领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权利”转交给日本。日本接收德国在中国占领区内的所有德国国家财产、铁路、矿山。（14/354页）

表面上帝国主义列强宣称：他们在中国取得的成绩是各国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实背后隐藏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以致最终导致一战的爆发。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都共同进退，因为他们之间互相不信任，谁也不想别的人继续待在棋局里面。表面上，帝国主义列强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去奴役征服其他国家，但是这种表面上的联盟并不能平衡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不能避免他们之间的战争。一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00年之后，这个道理重新变得重要起来，当帝国主义联盟进攻南斯拉夫之时，只有那些对历史一无所知的白日做梦者才会抱有一丝的幻想：认为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内帝国主义联盟的内部不可能爆发战争。

## 极具侵略性的德帝国主义

德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除了表现出与其他帝国主义相同的共同点之外，也有其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侵略性。从一开始德帝国主义就拥有成为最残酷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习性和愿望。他们想要通过无法想象的残忍手段来达到压倒其他帝国主义势力的目的。这种特殊性产生于德国帝国主义诞生的那一刻。德国，这个极具侵略性而又姗姗来迟的帝国主义强盗将他们的军国主义传统通过在中国的血腥手段，乃至于之后的二战中，都得以继续推进和提升。

到底殖民时期的占领和屠杀政策对之后的二战纳粹军队起到了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那种自我定位，通过那种对在世界历史上进行血腥军事行动的自豪感中得到答案：

“倘若我们国内之人，很简单地相信，以为此间将替基督文化及习俗，作一番宣传，那么事实上这些人无非只能得到莫大的失望而已。吾德自“三十年战争”以及法国路易十四之匪军（侵德）以后，（像北京）如此毁坏之惨，尚未尝复见。”（瓦德西日记，1900年11月20日15/502页）

德国帝国主义者用他们的政治核心思维以及在中国的侵略行动初步地证明了一个东西，他们将它在非洲纳米比亚的赫海霍族人和其他族人身上继续和更加变本加厉地执行，并在1939年之后暴露无遗：

那就是极端的军权残暴，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掠夺欲和杀戮欲，一群挣脱束缚的，可以犯下任何罪行，横行无忌的匪军。

## 资料来源

1. I.阿梅隆,《反抗外国的野蛮人:拳民和他们的传说》, [www.dhm.de/ausstellungen/tsingtau/katalog](http://www.dhm.de/ausstellungen/tsingtau/katalog)
2. S.达布林豪斯,《中国的拳民起义》,出版于哈根,1992.
3. 德国学术和科学(发行人),《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工人运动》,柏林,1970.
4. 《德国在中国 1900 至 1901 年》,由远伐的参加者编著,由战争画家霍肖尔绘图,阿道夫·额布斯特和其他人投稿,图赛尔多夫,1902年。
5. R.菲尔博,《绝不宽恕》,发表于《年轻世界》,20.6.00
6. G.费舍尔,《绝不宽恕!》,发表于《时代》27.7.00
7. P.弗来明,《包围北京》,法兰克福,1997
8. 《法兰克福评报》30.6.2000
9. 德国社会统一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发行人),《德国工人运动历史》,第4卷,1898年3月到1914年7月,柏林1951。
10. L.耶尔马修,《亚洲曙光》,柏林,1951.
11. E.基瑟尔,《当中国苏醒时——拳民起义》,埃斯林恩,慕尼黑1984
12. F.克莱,《档案中被歪曲的历史——欧洲内阁的大政治 1871 至 1914》,刊登在历史学杂志,第2册,柏林,1959
13. 中国现代史连载编著(发行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北京1978
14. P.科隆科,《包围北京》后记,P弗勒明,法兰克福,1997。
15. M.罗伊特勒,《样本殖民地 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
16. H.O. 麦斯勒,《陆军总司令阿尔弗雷德·格拉分·冯·瓦德西》,第3卷,斯图加特柏林,1923
17. R.奥科洛,《拳民暴动——暴力和悲剧》,慕尼黑1980
18. J.佩区尔·T·霍普克,《世界帝国的疯狂——德国殖民史》,慕尼黑1980
20. H.-C.施罗德,《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博巴德·哥德斯博革1975

## 附录

### 一. 毛泽东：关于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中国历史

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对中国采用了并且还正在继续地采用着如同下面所说的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一、向中国举行多次的侵略战争，例如 1840 年的英国鸦片战争，1857 年的英法联军战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争，1900 年的八国联军战争。用战争打败了中国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不但占领了中国周围的许多原由中国保护的国家，而且抢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例如日本占领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租借”了旅顺，英国占领了香港，法国“租借”了广州湾。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赔款。这样，就大大地打击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封建帝国。

二、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驻扎海军和陆军的权利，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并把全中国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

三、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在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并把许多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它们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的交通事业（海上的、陆上的、内河的和空中的）。因此它们便能够大量地推销它们的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的市场，同时又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

四、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五、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六、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利其剥削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

七、于买办阶级之外，帝国主义列强又使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变为它们统治中国的支柱。它们“首先和以前的社会制度的统治阶级——封建地主、商业和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占大多数的人民。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军事的势力，乃是一种支持、鼓舞、栽培、保存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官僚军阀上层建筑的力量。”

八、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

九、帝国主义列强在所有上述这些办法之外，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十、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更使已经变成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一大块土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上述这些情形，就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新的变化的又一个方面，就是把一个封建的中国变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的血迹斑斑的图画。

由此可以明白，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

（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于北京1968年，摘自360到362页。）

## 二. 胶州——德帝国主义的“样板殖民地”

1898年3月6日签订的《胶州条约》把15万平方公里的山东省变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根据该条约清政府必须将胶州租借给德国99年。德国获得优先参与所有在山东的外国资本企业的权利，优先修筑铁路和矿山开产权。4月27日，德皇威廉二世正式宣布胶州为德意志帝国的“保护区”。这个不平等条约保证了德国军队在划定的区域内自由行军的权利，赋予德国殖民者在该区管理事务中的发言权。

在此3年之前，德国军国主义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合约，根据合约清政府必须永久性地“转让”汉口一块超过40平方公里的土地。德国获得在该地域的优先特权，其中包括禁止中国人在地域内居住以及地域的最高司法权。就这样，中国不仅将自己领土的一部分，而且将区域内的自主主权转交给了德国。

（UG法布里彻克，《黄龙黑鹰》，1973，21页。/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北京，1978，5页到6页，47页/P。弗莱明，《包围北京》，法兰克福，1997，347页/M罗伊特勒，《样板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柏林，1997，241页。）

### 三. 关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中国的两个重要方面

#### 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矛头的传教士

中国的革命力量带着特别强烈的和合情合理的憎恨追捕帝国主义传教士。为什么？传教士享有特权，他们收买所谓的“吃饭的基督教徒”作为自己的信徒。这些信徒都是改变宗教信仰的中国老百姓。那些所谓的基督教区都由各自的帝国主义势力保护，而且享受特权。这就表示，他们可以不受基督法则管制地进行诈骗，甚至抢劫。

再者，帝国主义传教士带着欧洲大国沙文主义的傲慢践踏中国百姓中存在的宗教理想和需要。他们经常拆毁村庄寺庙，以修建教堂。在 1861 年到 1899 的这段时间就有 811 宗“教堂纠纷”登记在案。（2/32 页）

革命起义者很快就认识到传教士活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慈善”，而是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在所有的德国传教士中约翰·巴布提斯特·安采尔（中文名安治泰）以他的血腥而出名。他是山东地区教会的大主教，其实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种矛头。安采尔被认为是在中国的最有侵略性的传教士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是一个好战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他的教会政策和德国的国会的侵略计划紧密相联。在帝国主义占领山东之后，一个反对传教的官员被撤职。后来安采尔甚至得到了二品顶戴，与中国总督平行。（2/32 页起）

#### 洪水和旱灾 —— 帝国主义掠夺以及官府腐败的结果

帝国主义推动的铁路建设，以及随之而来的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贪污，严重影响了灌溉系统、堤坝以及水渠的修建。结果是，过于严重的旱灾和洪涝灾害彻底地毁灭了当地老百姓生存的基础，而这些灾害看上去不太像是由自然本身造成的。

1855 年之后，在山东出现了经济动荡，加之由于黄河河床移位使得抗灾能力严重受到影响。洪水和旱灾一个接一个，农民大量的收成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反动掌权者、中央和地方官府官员经常将用于维修黄河堤坝的经费揣进自己的腰包。也正因如此，决堤事件接连不断。在 1897 到 1898 年间，大多数的治水设施都处于极度危险的状况。（详见 2/36 页和 1）

帝国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大肆宣传，一方面来痛斥中国起义运动的“反基督教性质”；另一方面把起义运动污蔑为愚蠢的和痴呆的行为，因为中国的起义力量通过一些奇怪的说辞把旱涝灾害的罪名强加给帝国主义。通过《胶州条约》德国帝国主义者获得了在水流治理问题上的发言权。铁路的修建严重威胁了“样板殖民地”内关乎农村生死存亡的灌溉系统。1902 年，在山东高密市境内进行的铁路修建工程完成之后，这种担心终于得到了证实。7 月，连着 4 天的强降雨足以造成严重的洪灾，在洪灾中数不尽的村庄遭到了摧毁，数不尽的农田被洪水淹没。在一份由一位德国海军工程师提交的秘密报告中，他提到：“洪灾毫无疑问是由于修建铁路造成的。”（15/241 页起）



#### 四. 大国沙文军事主义的煽动以及德皇威廉二世的“匈奴演说”

德国公使克林德的死(1900年6月20日)给了德国军国主义者一个向中国大量派兵的借口,从而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打击中国的反抗运动和扩张自己的殖民势力。在德国皇帝的演说中,除了大国沙文主义之外,德意志普鲁士军国主义观念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

在克林德实际遇害的前2天,就已经有关于他被杀的消息传到了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立即在1900年6月19日在一封给国务大臣冯·毕洛的信中宣称:“北京……必须被夷为平地。”(11/55页)在最早两个营的德国军队出发之际,德皇向他的士兵说道:“德意志的旗帜遭到了玷污……必须进行有示范性意义的惩罚和复仇”。根据这个演说的另外一种版本,德皇应该在此时就公开地宣布了“惩罚性讨伐”的规模。这个版本完全是按照3个星期之后发表的“匈奴演说”的意思撰写的。

“我希望用一种全世界还没见过的方式报仇。”(8)

该演说的影响可以通过一封出自“惩罚性讨伐”参加者的书信看出来:

“皇帝陛下在1900夏天发表演说之后,自愿者们响应了皇帝的号召,为了德国受到伤害的尊严向东亚进发。有数千自愿者踊跃报道,出于自己的责任感以及为了释放犯罪的渴望……”(11/222页起)

7月27日,当更多的战舰在不莱梅港整装待发之时,威廉二世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被作为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记录在德帝国主义历史中。德皇想让全世界明白,德国军队在即将展开的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第一次大型军事行动的任务是什么:

一座血腥残忍,无所顾忌的丰碑,“在中国的历史中烙上千年的印记”。

德皇用他的演说让他的士兵们向一个屠杀的征战宣誓。

“不要俘虏…从此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但是真正对外公开发表的演说却是一个“去尖锐化”过后的版本。德意志普鲁士政府再一次对媒体进行了审查控制,所有(几乎所有)的记者只能印刷“去尖锐化”之后的“匈奴演说”版本。但是一个叫做《西北德意志报》的,来自不莱梅港的地区小报却成功的印发了完整版本的演说。它的通讯员只能坐在离那些著名记者远的一个屋顶上将演说速记了下来。普鲁士审查局的官员们很明显是忽视了他们发行的报纸。小报的编辑察觉到,这将会成为一个“大事件”,然后迅速地将上千份报纸发送到了其他的城市,并发行了这些报纸。等审查局的官员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

(6)

没有经过审查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900年7月27日发表的演说应该是如下这样的:

“一个重大的任务正在等待着你们;你们要用你们的剑去惩罚已经发生了的不公正。中国人藐视了国际法,他们以一种在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方式,公然地践踏了使节的神圣,藐视了对来宾的义务。更加让人愤怒的是:这样的罪行恰恰是发生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以他们古老的文化引以为荣的国度。捍卫古老的普鲁士的优良品质,

用你们的行动来展示，作为基督信徒的你们能够忍受痛苦，愿荣誉和尊严紧随着你们的旗帜和的武器而来，给全世界树立一个男子气概和纪律的榜样.....

你们也许知道，你们将要面对的是狡猾的，顽固的，装备精良而且残忍的敌人。当你们到达的时候，就必须明白：绝不宽恕，不要俘虏。就象千年之前埃策尔国王(Etzel, 也叫阿提拉)麾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人’的威名也必须要靠你们在中国千年流传，以至于从此之后绝不会再有一个中国人胆敢对德国人侧目而视。上帝的祝福将与你们同在，整个民族的祈祷，我的祝愿将伴随着你们每一个人。为德意志的文化开辟一条永久的大道！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同志们，再见了！”（11/221 页起）

## 五 列宁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章，发表于《火星报》创刊号

对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人来说，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具有关乎世界政治的重大意义。列宁在1900年12月《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战争”的文章，控诉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揭露了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开始将中国瓜分的。当中国的广大人民最终站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蚕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向血洗屠杀过渡了。他强烈的谴责了帝国主义势力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尝试用来为自己罪行辩解的虚伪的谎言：

„欧洲政府一个接一个地疯狂地掠夺和租借中国的土地，无怪乎出现了瓜分中国的议论。如果按照真实的情况，就必须说，欧洲政府(俄国政府是其中最早之一)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公开的瓜分，而是偷偷的在进行，就像小偷。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把她洗劫一空，就像洗劫一个死人的财物一样，当这个假死的人开始试图反抗的时候，他们就像野兽一样扑到他身上。他们将一座座村庄烧毁，把老百姓赶进黑龙江中活活淹死，射杀和用刺刀捅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妇女和儿童。当所有这些基督徒建立功勋的时候，却冲着野蛮的中国人大叫大嚷地说，他们竟敢触犯文明的欧洲人。”(列宁，《中国战争》，1900年，第4卷，373页)

同时，列宁也领导了针对所谓“黄祸”的大国沙文主义煽动情绪的斗争，这种情绪不仅在俄国，而且是在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流传：

“试问，中国人对欧洲人的袭击，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的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说，这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憎恨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实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要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的人(1856年英法对华的人)，那些利用传教伪善地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不能痛恨他们吗？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早就对中国实行这种掠夺政策了……”

(同样的出处，372页)

## 六. 关于革命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抗德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政策的斗争

革命性的社会民主党在1900年十分明确和公开地批判了德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以及德国士兵野蛮屠杀义和团起义运动和中国百姓。就算它在整个过程中曾有过摇摆, 有过错误, 以及出现过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他的支持者。但是社会民主党是整个和唯一的一个真正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的力量, 在抗议活动中, 在国会的议会演说中。在多次的社会民主党会议上(比如在9月15到16日的第一次社会民主女性大会上)以及在1900年9月举行的党派集会上, 社会民主党人士都发表了反对德国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政策的意见。革命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指责了德国帝国主义的罪行, 并在社会民主刊物上举行了一次激烈的控诉运动。他们公开发表了所谓的“匈奴信件”, 在信中德国士兵自豪地报道他们在镇压起义后所犯下的残忍罪行。1901年11月初, 普鲁士军政在法院控告社会民主报在斯图加特、法兰克福以及柏林的编辑。数名编辑最后因此被判进了监狱。(参看1901年12月5日的《向前》, 2/580页, FN 42)

贝培尔(August Bebel)十分正确地将德国殖民政府定义为“专制主义思想...帝国主义思想”的表达。(3/555页)他在国会曾斥责, “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想把广阔的中国变成外国势力的附属.....”(18/207页)1900年9月在美茵茨召开的党派集会将会焦点定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上: “作为对抗所有的人剥削压迫人的行为的反对者, 社会民主党反对这种掠夺和侵略政策。社会民主党要求, 必须要通过尊重和保护的民族的权利, 自由和独立的方式, 来真正实现值得期盼的和必要的文化关系以及交流关系。”(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党派集会记录, 1900年9月17到21日。9/52页)

罗萨·卢森堡(Rosa Luxemburg)反对欧洲大国沙文主义以及反对极端国际主义宣传的斗争时变得重新热门起来: „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支柱, 并不是欧洲的团结, 而是国际的团结, 包括整个世界, 所有种族和所有的国家。任何小范围的团结都不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国际团结进程中的一个阶段, 相反, 正好是它的对立面, 是它的敌人, 是模糊概念, 其真正的目的是国家间的对抗。就像我们一直跟泛日耳曼主义, 泛斯拉夫主义, 反美主义这些反动思想做斗争一样, 我们也必须跟泛欧主义做同样的斗争。”(罗萨·卢森堡, 《和平乌托邦》, 1911, 选集, 第2卷, 柏林, 1986年, 503页)

1900年6月20日, 克林德遇害的当天, 梅林(Mehring)在《新时代》上也对德国帝国主义利用掠夺性殖民战争的真正目的, 做出了解释:

“.....每个帮助给中国人铸造一副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的工人, 到头来将给他自己铸造一副更紧的枷锁。”(摘自9/40页)

罗萨·卢森堡在1900年9月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共产主义者大会上号召颁布一份对抗殖民政策的决议。她要求:

“每个国家的工人党派必须要用加倍的力量和精力去反抗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所有出席议会的社会主义代表有绝对的义务, 给所有的给军国主义, 海上霸权主义或者殖民侵略的拨款支出计划投反对票”。(罗萨·卢森堡, 1900年在美茵茨党派集会的发言, 合集, 第1卷, 上卷, 80页, FN1)

德国社会民主党曾展开了一场论战, 关于抗议活动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中的意义和评估。罗萨·卢森堡的评论在这场论战中起到了相当突出的作用: “中国战争是世界政治时代第一件所有文明国家都卷入其中的大事件, 联合工人政党本应该组织一场抗议来回应国际上的反应以及神圣联盟”。(801页)

她很正确地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 “在所有向中国发动侵略的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政党本来必须掌握主动权”。(801页)

她还详细地批评指出，“在抗议游行当中并没有有计划地开展宣传活动”。（800 页）

她继续指出，局外人很有可能获得错误的信息：“尽管我们的党在很多事件中都组织过相当有趣的抗议活动，然而，此时事关一场由联合欧洲资本主义发动的对亚洲的血腥侵略战争，我们的党却由于太过于担心正式的大国沙文主义，而显得太过于平静。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灾难性的。”（800 页）

她也进行了自我批评：“.....现在重要的是，将所有国家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人号召起来，但是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党对此不仅在自己的国家毫无行动，而且在涉及到国际团结的时候也毫无行动。”（801 页）卢森堡将她的论战锋芒指向公开的大国沙文主义机会主义立场，其代表如考茨基(Kautsky)。虽然考茨基此时已经有向修正主义发展的迹象，但他在此时并没有完全地转向反对革命的机会修正主义阵营。考茨基曾用欧洲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强调地拒绝了，“暴政对抗文明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新时代》，19 年度，第 1 卷，1900 到 1901 年，摘自 20 163 页）。殖民地人民的斗争看上去仍然是“毫无出路”，他解释道：“我们非常明白这些反抗，我们非常理解这些反抗者，但是社会民主党并不能帮助他们，就像它不能帮助毫无出路的欧洲无产阶级改变一样。”（20 /1631 页）

### 贝培尔的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贝培尔是这么清醒和坚定地拒绝和对抗德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侵略行径，他为德国殖民军队的暴行得以在国内得到报道，为“匈奴信件”作为控诉德国军国主义的罪证得以公开，做出了这么决定性的贡献。但是，他对德国公使克林德受到了中国起义运动应有的惩罚的事件的态度是不可原谅的。

他在 1900 年 11 月 10 日的国会上说道：

“那么，我的先生们，这是犯罪，这正是犯罪，就像之前我们的士兵遭到谋杀一样，两事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我正想说的是：对德国公使所犯下的罪行，是极大仇恨的结果，是愤怒到了顶峰的结果。在经历了这些我刚才向您所报告的，在 6 月 20 日之前发生的事件发生之后，北京的广大群众终于开窍了。在任何情况下谋杀公使都是一种犯罪，这个词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至少有可以减轻处罚的原因。（非常正确！在社会民主党人士那里。）”（摘自 18 /208 页）

相对的是，中国士兵恩海射杀在整个北京城臭名昭著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的事件受到了中国革命者的极大赞成和支持。贝培尔不仅认识到了军队扮演的角色，还认识到了“平民”和传教士对德帝国主义所起的作用。他们共同剥削和掠夺中国，并对此负责。贝培尔也知道，克林德除此之外还是一个声名特别狼藉的杀人狂。贝培尔的演说有很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他在那个时刻正好颠倒了凶手和受害者的位置。在那个时刻，其实是罪犯从受害者那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贝培尔在国民的压力之下放弃了自己本来（正确）的态度和主见。

备注：

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并没有提到“种族”这个词，而是比较正确地使用了肤色：“.....不管肤色，信仰，国籍或是性别.....”（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章程以及行政规章》，1871，马克思/恩格斯集，第 17 卷，441 页）

Vor einhundert Jahren wurde China von den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unter Kaiser Wilhelm II. gemeinsam mit anderen Imperialisten überfallen. Der Aufstand der Yihotuan-Bewegung, der sogenannte „Boxeraufstand“ antiimperialistischer Kräfte gegen die europäischen und japanischen Ausbeuter, wurde blutig niedergeschlagen.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wollten ihren Anteil am Kuchen, an China. Und sie wollten der Welt beweisen, dass die deutschen Militärs die übrigen Imperialisten im Rauben und Morden allemal übertreffen.

## **Imperialistische Eroberung und Ausbeutung Chinas**

Nach einer 400jährigen Kolonialgeschichte wurde die Welt vor 100 Jahren unter den imperialistischen Großmächten endgültig aufgeteilt. China, das riesige Reich, wurde für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die zu spät gekommenen Räuber, die die nationale Einheit 1871 von oben als „bürokratisch gezimmerter, polizeilich gehüteter Militärdespotismus“ (Marx) – ohne siegreiche bürgerliche Revolution durchgeführt hatten, ein bevorzugtes Gebiet, um sich vor allem gegen den englischen Imperialismus, aber auch gegenüber den anderen imperialistischen Großmächten ein Stück dieses riesigen Kuchens abzuschneiden. Der Kaiserliche Berater Generaloberst Moltke stellte 1899 offen fest:

„denn wenn wir ganz ehrlich sein wollen, so ist es Geldgier, die uns bewogen hat, den großen chinesischen Kuchen aufzuschneiden. Wir

wollten Eisenbahnen bauen, Bergwerke in Betrieb setzen, europäische Kultur bringen, das heißt in einem Wort Geld verdienen.“ [14/S. 349]

### **Zunehmende kolonialistische und imperialistische Unterdrückung**

Die hauptsächliche Ursache für den revolutionären Aufstand im Norden Chinas im Jahre 1900 war die zunehmende kolonialistisch-imperialistische Unterdrückung, die von allen imperialistischen Großmächten in den vorangegangenen zehn Jahren ständig ausgeht und verschärft worden war. Dabei hatten die aggressiv auftretenden Missionare und die um ihre Profite besorgten Eisenbahn- und Bergwerkskapitalisten entscheidenden Anteil bei der Verschärfung der Unterdrückungs- oder wie sie es nannten: „Strafmaßnahmen“.

## **Der revolutionäre Aufstand der Yihotuan-Bewegung**

Im Jahre 1899 kam es in der Provinz Schantung zur bewaffneten Erhebung der Yihotuan, der sogenannten „Boxer“ (Yihotuan bedeutet „Fäuste für Gerechtigkeit und Brüderlichkeit“ [siehe: 10/S. 179 und 18/S. 209] und die Mitglieder der Yihotuan übten sich im chinesischen Boxen). Die Yihotuan-Bewegung bestand zu einem großen

Teil aus Bäuerinnen und Bauern, Landarbeiterinnen und -arbeiten sowie Handwerkern. In der Provinz Schantung hatte sie ihren größten Einfluss. Die Kämpfe der Yihotuan richteten sich gegen die Macht und Ausplünderung des Landes durch die Imperialisten und ihre Handlanger. Die Aufständischen töteten Missionare sowie deren

chinesischen Helfershelfer und griffen die deutschen Militärs an.

### **Entstehung der Widerstandsbewegung in der von den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beherrschten Provinz Schantung**

Die durch die imperialistische Aggression hervorgerufenen Hungersnöte im Winter 1898/99 waren in Süd-Schantung Auslöser für Angriffe auf die reichen Missionsstationen, insbesondere die deutsche Steyler Mission.

Korruption und Betrug verschärften die Lebensbedingungen der ausgebeuteten und werktätigen Landbevölkerung zusätzlich. Der Widerstand richtete sich gegen diese verschärfte Ausplünderung und gegen die Freisprechung der korrupten Beamten und ihrer deutschen Oberherren durch die Justiz. Die deutschen Kolonialherren, an der Spitze oft genug Bischof Anzer, reagierten mit der „Bestrafung“ ganzer Dörfer, „vertraglich“ mit den chinesischen Regierungsstellen abgesichertem Grundstücksraub, dem Abriss von Tempeln und dem Bau christlicher Kapellen, der Erpressung von „Schmerzensgeld“ von den Dörfern des Widerstands und der Forderung nach demütigender öffentlicher Abbitte durch die Gelehrten der Dörfer.

Ab Anfang 1899 gelang es der Yihotuan-Bewegung zunehmend, den in Süd-Schantung vorangetriebenen Eisenbahnbau und die Vermessungen und Probebohrungen für den Bergbau zu behindern. Die Bauern befürchteten zu Recht weitere Zerstörungen ihrer lebenswichtigen Bewässerungssysteme. Die Eisenbahn- und Bergwerksgesellschaften drängten deshalb auf Militäraktionen gegen den Widerstand. Zur

Vorbereitung führte der deutsche Offizier Hannemann eine „Erkundungstour“ durch. Von den Bauern der Gegend zur Rede gestellt, schossen er und seine Begleiter in die Menschengruppe. Wenige Tage später kam direkt aus Berlin von der Reichsregierung die Instruktion:

„Expedition unternehmen als Polizeimaßregel. An Truppenstärke nicht sparen.“ [15/S. 245]

Daraufhin trieben deutsche Soldaten unter Führung Hannemanns am 2. April 1899 die Einwohner des Dorfes Hanjiacu aus ihren Häusern, durchsuchten den Ort und brannten ihn schließlich nieder. 40 Höfe mit ca. 300 Gebäuden wurden zerstört. Die „Expeditionstruppe“ zog weiter, besetzte die Stadt Rizhao, nahm Geiseln, forderte „Strafgelder“ ein.

Im Februar und Mai 1900 gab es revolutionäre Erhebungen in Schantung, die jedoch niedergeschlagen wurden. Im Mai 1900 wurden in ganz Nord-Schantung Eisenbahnen und Telegraphen von den Kämpferinnen und Kämpfern der Yihotuan zerstört. Und wichtiger noch: Es gelang ihnen mehr und mehr, die Sympathie und Unterstützung der ländlichen Bevölkerung zu gewinnen. Yihotuan-Mitglieder wurden zu illegalen Treffen in den Dörfern eingeladen, um die Einwohner in Kampftechniken auszubilden und sie auf Aktionen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Truppen vorzubereiten. [15/S. 245–249]

„*Tod den Imperialisten!*“ war die Hauptlosung der aufständischen Yihotuan-Bewegung, die sich während der großen Dürre im Frühjahr 1900 auf ganz Nordchina ausweitete. Es gelang der Yihotuan, bei ihren Angriffen etwa

200 Missionare und Tausende ihrer Kollaborateure zu töten. [1] Im Mai rückte die Yihotuan schließlich auf Peking vor, dort befand sich die größte gemeinsame Bastion der imperialistischen Unterdrücker. Diese forderten nun von den herrschenden Feudalen und Kompradoren die Liquidierung der Yihotuan, doch die chinesischen Machthaber befürchteten, dass sich die massiv anwachsende Bewegung am Ende auch gegen sie selbst richten könnte.

### **Vorstoß der Kämpferinnen und Kämpfer der Yihotuan nach Peking**

Ende Mai trafen in Peking mit Genehmigung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mehrere hundert Soldaten der Kolonialmächte zum „Schutz“ der Gesandtschaftsviertel ein. Einen Monat später wurden die 20 imperialistischen Kriegsschiffe vor dem Dagou-Fort zusammengezogen und um weitere verstärkt. 600 Soldaten gingen an Land.

Wo es ihnen möglich war, stürten die Kämpferinnen und Kämpfer der Yihotuan den Nachschub der imperialistischen Kolonialtruppen. Am 10. Juni griffen sie 2.000 Soldaten unter Führung des britischen Admirals Seymor an, die ohne Zustimmung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auf Peking vorrückten, und konnten einen wichtigen Teilerfolg erzielen: Der imperialistische Soldatentrupp musste aufgeben und sich zurückziehen. „Germans to the front“ hieß es bei einem der Rückzugsgefechte am 22. Juni, worauf die deutschen Militaristen noch heute stolz sind.

Die Kampfverbände der Yihotuan zogen am 13. Juni in Peking ein. Der deutsche Gesandte Ketteler hatte die

Situation noch einige Tage zuvor beschrieben:

„4 bis 5.000 Mann starkes aufrührerisches Gesindel der Boxer ist bis in unmittelbare Nähe von Peking gedrungen, hat beide Eisenbahnlinien Tianjin-Peking und Baodingfu-Peking, cirka 30 Kilometer von hier, besetzt, fremde Angestellte vertrieben und teilweise verwundet, Stationsgebäude verbrannt.“ [15/S. 499]

In den Gesandtschaftsvierteln hatten die Imperialisten aber weiterhin uneingeschränkt die militärische Macht. Der „Schutz“ dieser Viertel durch die Kolonialsoldaten hatte bereits vielen hundert Aufständischen das Leben gekostet. Sie wurden von den imperialistischen Soldaten einfach „abgeschossen“, weil sie unter den Militärs und den Zivilisten der imperialistischen Länder als „Freiwild“ galten und ihre Ermordung keinerlei Konsequenzen nach sich zog. Am 16. Juni umzingelten britisch-amerikanisch-japanische Truppen einen Tempel und ermordeten innerhalb von zehn Minuten 46 Yihotuan-Mitglieder. [15/S. 499]

Am 17. Juni eroberten imperialistische Marineeinheiten unter Beteiligung des deutschen Kanonenbootes Iltis das Dagou-Fort.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brach daraufhin am 19. Juni die offiziellen Beziehungen zu den Kolonialmächten ab und erklärte ihnen am 21. Juni den Krieg. Hinter verschlossenen Türen versicherte die Tjing-Regierung den ausländischen Gesandtschaften jedoch gleichzeitig, dass sie diese ernsthaft beschützen würde. Besorgt um ihre eigene Macht, sahen sich die chinesischen Machthaber zu dieser „Kriegserklärung“ gezwungen, um den sich ent-



wickelnden massenhaften Aufstand gegen die Imperialisten in den Griff zu bekommen und schließlich vernichten zu können. [13/S. 63 f.]

### **Bestrafung der preußisch-militaristischen Arroganz: Die Hinrichtung des deutschen Gesandten Ketteler**

Ketteler war eine der widerwärtigsten Figur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China. Arrogant und Größenwahnsinnig zugleich hatte er sich in Peking als Inbegriff deutsch-reaktionär-imperialistischer Herrenmenschenmentalität verhasst gemacht. In ganz Peking war bekannt, dass er grundlos eigenhändig chinesische Jugendliche verprügelte. So geschehen am 13. Juni, die Aufforderung auf Freilassung durch den chinesischen Polizeipräsidenten ignorierte Ketteler und der Jugendliche wurde Tage später angeblich „auf der Flucht erschossen“. [11/S. 66] In ganz Peking war bekannt, dass Ketteler mit seinen „fröhlichen Gesellen“ von der Mauer des Botschaftsgeländes aus eine bestialische „Variante“ des Taubenschießens mit menschlichen Zielscheiben veranstaltete: ein „Chinesenschießen“. Dutzende von chinesischen Bewohnern Pekings wurden dabei bei der Gymnastik einfach niedergeschossen, ermordet. Angeprangert wurden diese mörderischen Verbrechen durch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 im Reichstag. August Bebel deckte auf, dass Ketteler und seine Soldaten am 14. Juni von der Stadtmauer auf eine 300–400 m entfernte, friedlich versammelte Menschengruppe geschossen und dabei mindestens sieben Chinesen ermordet hatte. (Reichstagsrede vom 10. November 1900 in [18/S. 208])

In seiner kolonialistischen Überheblichkeit der Vorstellung erlegen, dass es niemals ein Chinese wagen, geschweige denn schaffen würde, gegen ihn erfolgreich die Waffe zu richten, ließ Ketteler sich am 20. Juni 1900 inmitten der Kämpfe in einer Sänfte aus dem Gesandtenviertel tragen und wunderte sich dann doch, dass er von den revolutionären Aufständischen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und mit einer Kugel im Kopf bedient wurde.

Auf Druck der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musste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am Ort seiner Erschießung ein „Sühnedenkmal“ errichten. Es wurde nach der Kriegserklärung Chinas an Deutschland im Ersten Weltkrieg 1917 geschleift.

### **Die Niederlage des Yihotuan-Aufstands**

Nun begann die Belagerung und Beschießung des Gesandtschaftsviertels durch die Yihotuan-Widerstandskämpfer und die reguläre Armee, die bis zum 14. August andauern sollte und in deren Verlauf die Imperialisten mit einem Tross von 4.000 Soldaten und Zivilisten sowie 3.000 chinesischen Kollaborateuren nur 66 Tote zu verzeichnen hatten.

Die vorgetäuschte „Kriegserklärung“ der chinesischen Machthaber hatte ihr Ziel nicht verfehlt und die Yihotuan-Bewegung tatsächlich zeitweise getäuscht. Dadurch konnten die Imperialisten und die mit ihnen verbündeten chinesischen Kompradoren und Feudalen eine erfolgreiche Hinhaltenaktik einschlagen, um Zeit für den Nachschub größerer Truppenkontingente zu schinden.

Lobend stellen bürgerliche Geschichtsschreiber beispielsweise über den Oberbefehlshaber der Kaiserlichen Armee Jung Lu fest, dass „dessen Hin-

haltestrategie die Erstürmung des Gesandtschaftsviertels verhindert hatte“. [17/S. 309 f.] Auch der vorübergehende Waffenstillstand vom 16. Juli bis zum 4. August war ein solches Täuschungsmanöver. Doch gleich darauf zeigten die chinesischen Machthaber wieder offen, auf welcher Seite sie standen: In Erlassen wurden die Aktionen der sogenannten „Boxerbanditen“ verurteilt und zur ihrer Bekämpfung aufgerufen. [15/S. 492]

### **Imperialistische „Strafexpeditionen“ unter deutschem Oberkommando**

Der deutsche Imperialismus nahm die Hinrichtung von Ketteler zum Anlass für eine weitere Aufstockung seiner Truppen in China. Am 3. Juli stachen die Kriegsschiffe Frankfurt und Wittekind mit 2.500 Soldaten in See, erreichten Peking jedoch erst nach der Niederschlagung des Yihotuan-Aufstands am 29. August.

Wüst erlogene Pressemeldungen über angebliche in Peking stattfindende Massaker bereiteten im Anschluss die gesamte imperialistische Welt auf eine massiv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in China vor. Unter der Überschrift „Das Massaker in Peking“ lancierte die englische Zeitung „Daily Mail“, dass das Gesandtschaftsviertel am 6./7. Juli ohne Munition überwältigt und jeder „in grausamster Weise dem Schwert überliefert“ worden sei. Andere Zeitungen übernahmen diese Falschmeldung und heizten die chauvinistisch-rassistische Kriegshetze von der „gelben Gefahr“ (Kaiser Wilhelm) mit selbsterfundenen Zusätzen weiter an, indem sie lancierten, dass „die Männer ihre Frauen und Kinder erschossen hatten, ehe sie sich selbst töteten“. [7/S. 167 f.]

In der Zwischenzeit waren die in China stationierten imperialistischen Truppen auf 20.000 Mann verstärkt worden. Hochgerüstet und militärtechnisch den chinesischen Truppen und den Yihotuan-Widerstandskämpfern überlegen, rückten sie auf die Millionenstadt Tientsin vor und besetzten sie am 14. Juli. Peking wurde am 14. August erobert. Die Zeit des massenhaften Mordens, Plünderns und Brandschatzens begann.

Die Imperialisten schürten die chauvinistische Kriegsstimmung und stellten eine alliierte imperialistische Streitmacht zusammen. Sie umfasste 87.000 Soldaten und 176 Kriegsschiffe. Beteiligt waren daran neben Deutschland mit 20.000 Soldaten auch Frankreich, Russland, England, Japan, USA, Italien und Österreich-Ungarn. [5]

Die deutschen Transporte des „Ostasiatischen Expeditionskorps“ verließen Bremerhaven in zwei Schüben (27.7.–4.8. und 31.8.–7.9.1900). Dies war die bis dahin größte seemilitärische Anstrengung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und stellte gleichzeitig eine machtpolitische Demonstration gegenüber seinen imperialistischen Konkurrenten dar. Die Kosten dafür beliefen sich auf fast 150 Mio. Mark. [11/S. 221] Deutlich wird der Stolz auf die steigende militärische Roll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bei der Aufteilung von Kolonien und Einflussphären in einem damals von „Teilnehmern der Expedition“ verfassten militaristischen Buch:

„Das Erscheinen der starken deutschen Land- und Seestreitkräfte in

so entfernten Teilen der Erde, diese erste Entfaltung deutscher Macht zu aktivem Eingreifen in die Weltpolitik, hat ihren Eindruck nicht verfehlt.“ [4/S. 81]

Gleichzeitig wurden darin aber die kolonialistisch-imperialistischen Motiv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vertuscht, was sicher auf den öffentlichen Druck durch die revolutionären Kräfte in der Sozial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zurückzuführen war:

„Nichts lag indes der deutschen Politik ferner, als, auf Eroberungen ausgehend, an die damals viel besprochene Aufteilung Chinas zu denken.“ [4/S. 103]

### **Die „Hunnenrede“ von Kaiser Wilhelm II. und die Umsetzung durch die deutsche Soldateska: Vergewaltigung, Raub und Mord**

Schon bevor die ersten Transporte in Richtung China aufbrachen, hatte Kaiser Wilhelm II. am 19. Juni – noch vor der Hinrichtung Kettlers – an seinen Staatssekretär von Bülow unmissverständlich vorgegeben, wie die soldatischen „Herrenmenschen“ in der chinesischen Hauptstadt ihr blutiges Handwerk durchzuführen hatten:

„Peking muss regelrecht angegriffen und dem Erdboden gleichgemacht werden ... Peking muss rasiert werden ... Es ist der Kampf Asiens gegen das ganze Europa.“ [11/S. 55 f.]

Beim Auslaufen des ersten Truppenkontingents machte Wilhelm II. am 27. Juli in seiner berühmten „Hunnenrede“ der Weltöffentlichkeit klar, worum es den deutschen Militaristen und Imperialisten in China geh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 so muss der Name „Deutscher“ in China auf tausend Jahre durch euch in einer Weise bestätigt werden, dass niemals wieder ein Chinese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auch nur scheinbar anzusehen.“ [6]

Rasch zeigte sich, dass die deutschen Soldaten durch die chauvinistischen Hetztiraden entsprechend „eingestimmt“ waren. Eisenbahnzüge, die die deutschen Einsatztruppen nach Bremerhaven zu ihren Schiffen brachten, waren mit militaristischen Parolen wie „Rache ist süß“ und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bekrizelt.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bestimmten Graf Waldersee zum Leiter der eigenen Truppen und erreichten seine Anerkennung als Oberkommandierenden der alliierten Truppen. Waldersee, bereits im Krieg 1870/71 unter Feldmarschall von Moltke im deutschen Generalstab, brachte „einschlägige“ Erfahrungen aus der blutigen Niederschlagung der Pariser Kommune mit.

Da Peking bis zum Eintreffen Waldersees bereits niedergemacht worden war, beschäftigte sich die imperialistische Allianz unter seiner Führung, vor allem aber auch die deutschen Truppen, mit sogenannten „Strafexpeditionen“. Sie brandschatzten, vergewaltigten, mordeten und raubten im Sinne der kaiserlichen „Hunnenrede“ mit dem Ziel, „dem deutschen Namen“ in China den Klang zu geben, die brutalsten und gierigsten aller Imperialisten zu sein. Von den 75 angeordneten Strafexpeditionen wurden 48 ausschließlich von deutschen Einheiten durchgeführt. [11/S. 224] Selbst andere Imperialisten mussten feststellen: „Seit der Ankunft

der Deutschen Korps wurde wieder mehr geplündert und vergewaltigt.“ [19/S. 257] Diese „Strafexpeditionen“ dauerten bis zum Mai 1901.

Dreiviertel der Einwohner Pekings waren bereits geflohen. Per Erlass war den Soldaten ausdrücklich eine dreitägige Plünderung gestattet worden. Tatsächlich aber hörten die deutschen Soldaten während ihres ganzen Aufenthalts niemals damit auf. Selbst Waldersee musste die Plünderungen eingestehen und heuchelte zugleich:

„Unglücklicherweise fehlte es nicht an anderen, das Plündern begleitenden Exzessen: Vergewaltigungen von Frauen, nicht zu beschreibende Grausamkeiten, Morde, willkürliche Brandstiftungen etc.“ [13/S. 102]

Wer als Yihotuan-Mitglied oder -Sympathisant verdächtigt worden war, wurde erst gefoltert und dann ermordet. Aus der Schilderung einer Botschaftsangehörigen lässt sich erahnen, wie die Konterrevolution gewütet haben muss:

„Soldaten und Einheimische stürzten sich auf die Boxer und erschlugen einige Hundert samt ihren Anführern, die für all die Not, die man in letzter Zeit hatte erleiden müssen, verantwortlich waren.“ [17/S. 135]

Die Zivilbevölkerung wurde beraubt, Geschäfte wurden geplündert, Frauen vergewaltigt und anschließend die Häuser niedergebrannt. Die Stadt Baoding, eine Hochburg der Yihotuan-Bewegung, wurde unter dem persönlichen Befehl Waldersees zu einem erheblichen Teil zerstört. [2/S. 52]

Wie die deutschen Soldaten ihr mörderisches Handwerk ganz im Sinne der kaiserlichen Anweisungen erledigten, wurde durch Briefe dieser Soldaten an ihre Familien bekannt. Diese damals

als „Hunnenbriefe“ bezeichneten grausigen Schilderungen wurden zur Anprangerung der Verbrechen von Vertreter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in mehreren sozialdemokratischen Zeitungen veröffentlicht. August Bebel zitierte aus einem dieser Briefe:

„Wie wir die erste Schlacht gewonnen hatten, da hättest Du sehen sollen, wie wir in die Stadt einrückten. Alles, was uns in den Weg kam, ob Mann, Frau oder Kind, alles wurde abgeschlachtet. Nun, wie da die Weiber schrieen! Aber des Kaisers Befehl lautet: keinen Pardon geben! und wir haben Treue und Gehorsam geschworen und das halten wir auch.“ [6]

Die Bevölkerung ganzer Ortschaften wurde niedergemetzelt und ihre Dörfer niedergebrannt. So heißt es in einem Brief eines deutschen Soldaten zu der Ortschaft Liangxiang bei Peking, es wurde

„alles niedergemetzelt, was uns in die Finger kam, dabei wurden weder Weib noch Kind verschont. Gegen Abend brannten wir die ganze Stadt nieder. Der 11. September war bis jetzt der blutigste Tag, den ich in China mitmachte. Ich sah an diesem Tag eher einem Metzger als einem deutschen Soldaten ähnlich.“ [6]

Ein anderer Soldat machte aus seiner Mordlust keinen Hehl:

„Du kannst Dir vorstellen, mit welcher Lust wir über die Chinesen herfielen. Alles wurde zusammengeschoßen und gestochen, zum Schluss wurde das Gehöft angezündet.“ [5]

Der „Ostasiatische Lloyd“, das in Shanghai erscheinende Organ der deutschen Kapitalisten in China, veröffent-

lichte am 8.2.1901 den Bericht eines Teilnehmers an einer der „Strafexpeditionen“ gegen die Bevölkerung von Orten, in denen die Yihotuan-Bewegung aufgetreten und unterstützt worden war. An dieser Schilderung zeigt sich auch, welche besondere „Freude“ an Grausamkeit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kennzeichnet:

„Dicht an der hohen, steilen Mauer waren fünf Gruben ausgegraben, so dass die Delinquenten bis zu den Hüften in der Grube standen ... zuerst stiegen drei in die Gruben, die Salve krachte, und die Leichname stürzten in die Grube zurück; ohne zu zucken, stiegen die fünf anderen in dieselben Gruben. So ist noch eine ganze Reihe von Chinesen in der nächsten Zeit hingerichtet worden ...“

„Ich kann nur sagen, dass wir bei allen Hinrichtungen, denen wir nachher beiwohnten, ohne jedes Mitleid und fast mit einer Art grimmigen Behagens zuschauten und dass es uns leid tat, dass diese Bestien so schnell sterben durften und dass es nicht mehr waren.“ [12/S. 32 f.]

Generalmajor Hopfner tat sich mit seinen 1.700 Soldaten bei der Vernichtung der Kämpferinnen und Kämpfer der Yihotuan hervor. Am 11. September wurde die Stadt Liangsiang, ca. 15 Meilen südlich von Peking, erst nach schweren Kämpfen erobert und „alle Boxer bestraft“, sprich: ermordet. In Sinhiau, 18 Meilen westlich von Peking, setzten die deutschen Truppen ihr Mordwerk fort. Zusammen mit englischen, amerikanischen und japanischen Truppen zerstörten sie zwei Tempel, das vermutete Hauptquartier der Yihotuan wurde eingäschert. [11/S. 261]

Die Brutalität der deutschen Soldateska war unbeschreiblich, bei Hinrichtungen verwendeten sie auch Häckselschneidemaschinen als Guillotine. So in Yung ning tshönn unter dem Kommando von Oberstleutnant Salsa, der drei „der Hauptführer“ der Yihotuan-Widerstandsbewegung festnehmen konnte. Neben der Todesstrafe legte er dem Ort außerdem eine Geldbuße von 5.000 Taels (15.000 Mark) auf.

„Den Armenstünderzug eröffnete der Scharfrichter, dessen Gehilfe eine Häckselschneidemaschine auf der Schulter trug. Man hatte sie bereits einige mal zu Enthauptungen erprobt und als Guillotine durchaus geeignet gefunden. Hinter dem Richtwerkzeug folgten die drei Verurteilten, stark gefesselt und mit den Zöpfen aneinander gebunden.

Der Richtplatz befand sich dicht vor dem Thore. Ohne jedes Sträuben ließ sich der erste Boxer auf das Holz der Häckselmaschine dicht am Messer legen, dann versucht aber der Scharfrichter vergebens, das Urteil zu vollstrecken. Selbst durch mehrmaliges Niederdrücken des schartigen Messers brachte er seinem Opfer nur verschiedene klaffende Wunden bei, bis der Mann sich von den ihn haltenden Leuten loswand, aufstand und einige Schritte weglief. Ein neuer Versuch des Scharfrichters hatte keinen besseren Erfolg, weshalb Oberstleutnant Salsa eingriff, um dem entsetzlichen Schauspiel ein Ende zu machen ... Einige Schüsse endeten die Qualen des Verurteilten, der mit halb abgetrenntem Kopfe am Boden lag.“ [4/S. 216 f.]

Die unbeugsame Haltung der Kämpferinnen und Kämpfer der Yihotuan bis hin zu ihrer Hinrichtung müssen selbst die deutschen Militärs anerkennen:

„Gebrochen ging keiner dem Tode entgegen, wie man denn immer wieder die Beobachtung machte, dass die Chinesen mit einem bewunderungswürdigen Gleichmut starben, wahrscheinlich in der festen Überzeugung, für eine gute Sache zu fallen.“ [4/S. 263]

Zur Abschreckung wurden „Exempel statuiert“:

„Nach der Enthauptung der drei Verurteilten wurden die Köpfe – dem chinesischen Rechtsbrauche entsprechend – auf hohen Stangen aufgepflanzt, die Leichen in Särgen darunter gestellt. Sechs Stunden blieben sie so als Zeichen der Sühne unter militärischer Bewachung ... stehen.“ [4/S. 264]

Wenn die Truppen noch auf Widerstand stießen, dann übten sie grausam Vergeltung:

„In Tsai nü tschöng, dem nächsten größeren Städtchen, etwa 10 Kilometer nordöstlich des Bahnhofs Anting, wurden zwar Mauern und Stadtthor unbesetzt gefunden, doch zeigte die Bevölkerung ein höchst verdächtiges Verhalten. In fast jedem Hause fanden sich Boxeranzüge, rote Schärpen und eine große Anzahl Waffen, von der Armbrust bis zum neuesten Mannlicher-Gewehr. Die Häuser waren vielfach verrammelt und mussten erbrochen werden, wobei es zu blutigen Zusammenstößen kam. Als den Leutnant von Kummer der Befehl zur Räumung der Stadt erreichte, die wegen der thätlichen Widersetz-

lichkeiten durch Artillerie beschossen werden sollte, wurden die Reiter, die durch das Tragen der Boxerwaffen und das Führen von Handpferden behindert waren, von einer vielköpfigen Volksmenge derart bedrängt, dass es einer gebildeten Nachspitze, bei der sich Leutnant von Kummer persönlich befand, nur mit Mühe unter anhaltendem Karabinerfeuer gelang, das Thor zu gewinnen. Selbstverständlich büßte der Ort sein Verhalten, indem er kurze Zeit nachher unter den Granaten in Feuer aufging.“ [4/S. 324 f.]

Das von den Missionaren begonnene Werk der Tempelzerstörung setzten die deutschen Militärs fort. Über die Kleinstadt Paotin fu wird berichtet:

„Die Tempel, die den Boxern als Versammlungsort und als Schauplatz von Abschlachtungen gedient hatten, sanken in Asche.“ [4/S. 262]

Sechs Tempel und die Torgebäude der Stadtmauer gingen in Flammen auf. Zusätzlich wurde gegen die Stadträte eine Geldstrafe von 100.000 Taels (ca. 300.000 Mark) verhängt. Der erste Bürgermeister „haftete persönlich für die Einlieferung der Strafsumme aus dem eigenen Vermögen der Stadtväter binnen Monatsfrist (1. Dezember).“

Im Mai 1901, als längst alle Kampfverbände der Yihotuan zerschlagen oder aufgelöst worden waren, wurden zum Abschluss der „Strafexpeditionen“ von einer „deutschen Aktion“ gegen Zhangja-kou ein grausamer Höhepunkt gesetzt und mehrere hundert Menschen ermordet. [15/S. 492]

In Peking raubten die deutschen und französischen Imperialisten das wertvolle Observatorium mit seinen meter-

hohen Instrumenten aus Bronze. Als die beiden Räuber sich endlich über die Aufteilung der Beute einig waren, brachten die Deutschen ihren Anteil, u. a. einen Himmelsglobus, mit dem Dampfer nach Deutschland, wo er dann in Potsdam im Park von Sanssouci ausgestellt wurde. Selbst der Vertreter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reichte beim deutschen Oberbefehlshaber Protest ein. Die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en forderten im Reichstag die sofortige Rückgabe der geraubten Instrumente auf Kosten der Regierung. 1902, als die französischen Imperialisten ihren Anteil längst wieder an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zurückgegeben hatten, wiederholten sie ihre Forderung erneut in einer Resolution. In dem nach der Niederlag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m Ersten Weltkrieg abgeschlossenen Versailler Vertrag wurde Deutschland im Artikel 131 schließlich verpflichtet, die Raubstücke innerhalb von zwölf Monaten zurückzugeben. [11/S. 259]

### **Die deutschen Militaristen sind stolz auf ihre Gräueltaten**

Feldmarschall Waldersee schreibt über die Umsetzung der Hunnenrede durch die deutschen Soldaten bereits am 22. September 1900 an den deutschen Kaiser, aus dem der besondere deutsch-militaristische Geist hervorgeht:

„... an schärfstem Anfassen (hat es) nicht gefehlt, was hier sicherlich lange in Erinnerung bleiben wird. Die Zahl der dabei ums Leben gekommenen Chinesen ist eine sehr erhebliche. Durch alle deutschen Truppenteile geht ein frischer Geist ...“ [4/S. 265]

Die Brutalität und Rücksichtslosigkeit ihrer Vernichtungs- und Vergeltungs-

aktionen wird aus der Sicht des „Herrenmenschen“ gerechtfertigt:

„Der Chinese will eben Macht fühlen und beugt sich nur dem Fuße, der sich fest auf seinen Nacken zu setzen weiß.“ [4/S. 263]

Auf die Empörung und Kritik in der internationalen Presse reagiert Waldersee ganz in preußisch-militaristischer Manier:

„Wenn ich nicht gekommen wäre, ständen noch heute feindliche Truppen im Halbkreise drei Meilen von Peking, und die Chinesen lachten über uns. Nur wenn man so scharf vorgeht wie möglich und rücksichtslos, kann man mit ihnen weiterkommen.“ [16/S. 66]

Dies fasst kurz ein ganzes Programm des deutschen Militarismus zusammen, auf das der Nazi-Faschismus im Zweiten Weltkrieg aufbauen konnte und in den besetzten Ländern,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und letztlich in den Vernichtungslagern durchexerzierte.

### **„Bilanz“ der imperialistischen Verbrechen an den Volksmassen Chinas**

Über die Gesamtzahl der Opfer gibt es keine genauen Angaben. Ausgegangen werden muss jedoch von Zehntausenden von ermordeten und massakrierten Chinesinnen und Chinesen. [10/S. 187] Der amerikanische General Chaffee erzählte einem Journalisten über das Ausmaß der Mordtaten gegen die chinesische Bevölkerung:

„Auf einen einzigen Boxer, den man getötet hatte, kamen 15 harmlose Kulis oder Landarbeiter, nicht mitgerechnet die unbeabsichtigt getöteten Frauen und Kinder.“ [17/S. 264]

Selbst der deutsche Oberkommandierende Waldersee konnte nicht umhin einzugestehen, dass sich der „Umfang des Schadens“, der China durch Verwüstung und Raub zugefügt worden war, zwar „niemals berechnen lassen (wird), aber gewaltig sein (muss).“ [13/S. 101]

Die deutschen Militaristen schrieben damals sehr offen über die gewaltigen Opfer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weil sie sich damit vor aller Welt als die Brutalsten brüsteten:

„Die Verluste der Chinesen in jedem Gefecht sind erstaunlich groß gewesen; ihre Leichen bedeckten oft haufenweise das Gefechtsfeld.“ [4/S. 439]

August Bebel prangerte die Mordverbrechen der deutschen Soldateska im Reichstag als Eroberungskrieg an und charakterisierte darüber hinaus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als:

„so barbarisch, wie es niemals in den letzten Jahrhunderten ... vorgekommen ist.“ [19. Nov. 1900. Zitiert nach 3/S. 556]

Nordchina, die Hauptstadt Peking und die anderen Großstädte waren zum Teil zerstört und völlig ausgeplündert, unzählige Dörfer waren ausgeraubt und in Brand gesteckt worden, Straßen, Brücken, Bahnen waren zerstört.

### **Knebelnder „Friedensvertrag“ zur weiteren Ausplünderung Chinas durch die Imperialisten**

Diese Schäden, die „Kriegsbeute“, die Plünderungen im gewaltigen Ausmaß wurden von den Imperialisten in den „Friedensverhandlungen“ überhaupt nicht berücksichtigt.

Am 7. September 1901 wurde das sogenannte „Friedensprotokoll“ zwi-

schen China und den imperialistischen Staaten unterzeichnet. Dieses Knebelprotokoll verpflichtete China, über einen Zeitraum von 40 Jahren 450 Mio. Taels (rund 1,35 Mrd. Mark) an die Imperialisten zu zahlen. Durch eine jährliche Verzinsung von 4 Prozent wurde die zu tilgende Summe faktisch noch einmal mehr als verdoppelt, so dass sie tatsächlich insgesamt 982.238.150 Taels (ca. 3 Mrd. Mark) betrug. Für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die sich einen Anteil von 20 Prozent gesichert hatten, bedeutete dies eine Kriegsbeute von fast 600 Mio. Mark. 1917 machte den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die Entwicklung im Ersten Weltkrieg jedoch ein Strich durch die Rechnung. Mit der Kriegserklärung Chinas an Deutschland wurden die Zahlungen eingestellt.

Im „Friedensprotokoll“ musste sich China außerdem bereit erklären, die Taku-Forts „und alle anderen Befestigungen, die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Küste und Peking beeinträchtigen könnten“ schleifen zu lassen (Artikel 8). Bis zum Juni 1902 waren die Befestigungen vom Erdboden verschwunden. Die Waffeneinfuhr wurde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verboten. China musste zwölf neue Militärstützpunkte zwischen den beiden Großstädten Tientsin und Peking zulassen. Militärisch hatten sich die Imperialisten so für die Zukunft bessere Ausgangspositionen verschafft.

Für weitere kolonialistisch-imperialistische Eroberungen und für einen verbesserten Militärnachschub weit ins Landesinnere hinein wurde der Ausbau der beiden großen Wasserstraßen (dem Peiho und dem Wangpu) zur Schiffbarmachung für Kanonenboote angeordnet. Die enormen Kosten wurde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letztlich den Volksmassen Chinas, auferlegt und imperialistische Firmen verdienten daran (für die nächsten zwanzig Jahre waren das jährlich für den Peiho 60.000 Taels und den Wangpu 460.000 Taels). Russland besetzte die Mandschurei und erklärte sie zum Protektorat. Das „Friedensprotokoll“ sah außerdem eine Importsteuer von 5 Prozent sowie eine Erhöhung der Zölle vor.

Den Imperialisten kam es neben der finanziellen Ausblutung Chinas ganz besonders auf die Vernichtung der Yihotuan-Bewegung an, um mit der Ausbeutung Chinas möglichst ungestört fortfahren zu können. Die geforderte „Bestrafung der schuldigen Chinesen“ hatte viele Todesurteile zur Folge.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wurde verpflichtet, die Mitgliedschaft in einer Widerstandsbewegung gegen die Kolonialmächte zu verbieten und unter Todesstrafe zu stellen. Weiter wurde aufgrund der teilweisen Duldung oder sogar der Unterstützung der Yihotuan-Bewegung durch viele örtliche Beamte vor und während des Yihoutan-Aufstands festgelegt, dass Provinzbeamte in ihrem Gebiet für Widerstandsaktionen und andere Verstöße gegen das „Friedensprotokoll“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erden sollten. Die feudalen chinesischen Machthaber hatten – wie schon erwähnt – dies Verbot und die Bestrafung, sprich Erschießungen, in Peking unmittelbar nach dem militärischen Sieg der Imperialisten aus eigenem Interesse an der Vernichtung der Kräfte des Aufstands durchgeführt.

Obwohl die örtliche und regionale Yihotuan-Bewegung häufig von einfachen Bauern und Landarbeitern geleitet

wurde, hielten die Imperialisten die Intellektuellen, die sogenannten „Literati“ für die Anführer der Yihotuan-Bewegung. Für 45 Städte, in denen der Widerstand Imperialisten oder deren Kollaborateure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hatte, wurde festgelegt, dass dort die nächsten fünf Jahre keine Prüfungen mehr stattfinden dürften. Erreicht werden sollte damit, dass in diesen Städten neben den bisher bekannten keine neuen Mitglieder und Unterstützer der Widerstandsbewegung in öffentliche Ämter kamen.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hatten das erklärte Ziel, die

„materielle Züchtigung der Asiaten durch eine moralische Demütigung zu verstärken.“ [14/S. 351]

Die Hinrichtung ihres Gesandten Ketteler durch die chinesische Widerstandsbewegung hatte die deutschen Militaristen wohl tief getroffen. Außer einem Denkmal für Ketteler forderten sie die offizielle Verhängung der Todesstrafe für den Schützen En Hai, der bereits Ende 1900 auf Anweisung eines deutschen Kommandos enthauptet worden war. [7/S. 130] Außerdem sollte ein Mitglied des chinesischen Kaiserhofes in Berlin „vor dem deutschen Kaiser das Bedauer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über die Erschießung Kettelers erklären. Obwohl Prinz Chun, der Bruder des Kaisers, nach Berlin reiste und in der sogenannten „Sühneaudienz“ die geforderte Erklärung abgab, konnten die deutschen Kolonialherren die völlige Demütigung durch den geforderten „Kotau“, den Kniefall mit der Berührung der Stirn vor dem deutschen Kaiser, nicht erreichen. [14/S. 351]

## **Zusammenarbeit der Imperialisten als Auftakt für verstärkte imperialistische Rivalität**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konnten ihre Gebiete und Einflussphären gegen den Druck des aufsteigenden japanischen Imperialismus nicht halten, der China wie selbstverständlich als sein vor der Haustür liegendes Einfluss- und Kolonialgebiet ansah. Mit dem Ausbruch des Ersten Weltkrieges erklärte Japan Deutschland im August 1914 den Krieg und setzte den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mit seinen 4.000 deutschen Soldaten durch eine Armee von 65.000 Mann so unter Druck, dass der deutsche Gouverneur von Tsing-tau, Kapitän zur See Meyer-Waldeck, nach einer neuntägigen Beschießung 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im November 1914 bedingungs- und entschädigungslos an Japan übergab. Im Versailler Vertrag von 1919 musste Deutschland auch seine Niederlage in China eingestehen. Sämtliche eroberten kolonialen und halbkolonialen „Rechte“ wurden an Japan abgetreten, das deutsche Staatseigentum, Eisenbahn und Bergwerke gingen über in japanischen Besitz. [14/S. 354]

### **Die besondere Aggressivität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Bei allen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anderen Imperialisten hat 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durch sein militärisches Eingreifen in China seine Besonderheiten deutlich gemacht: Die besondere Aggressivität, die Mentalität und das Bestreben, als brutalste imperialistische Kraft gelten zu wollen und die anderen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mit unvorstellbaren Gräueltaten noch zu übertreffen. Diese Besonderheit war die Geburtsstunde je-

Die großen Phrasen der Imperialisten, die behaupteten, dass sie ja in China ihre gute Zusammenarbeit bewiesen hätten, war nur der Auftakt für eine verstärkte imperialistische Rivalität, die zum Ersten Weltkrieg führte. Die Imperialisten waren in China gemeinsam vorgegangen, weil keiner dem anderen traute und jeder den anderen in Schach halten wollte. Auch die scheinbar festen Bündnisse der Imperialisten zur Unterjochung einzelner Länder konnten, wie der Erste Weltkrieg zeigte, nicht die grundlegende Gesetzmäßigkeit der imperialistischen Konkurrenz und der Unvermeidbarkeit imperialistischer Kriege im Imperialismus außer Kraft setzen.

Einhundert Jahre später ist diese Lehre bei der imperialistischen Allianz gegen Jugoslawien um so wichtiger, da nur geschichtslose Träumer die Illusion haben können, dass es unmöglich ist, dass die Imperialisten dieser Allianz nicht einige Jahre oder Jahrzehnte später auch gegeneinander Krieg führen.

nes aggressiven, zu spät gekommenen imperialistischen Räubers, dessen Methoden und Gräueltaten in China später in der Tradition des deutschen Militarismus wieder, insbesondere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allen überfallenen Ländern eingesetzt, weiter vorangetrieben und gesteigert wurden.

Wie sehr die kolonialistische Eroberungs- und Vernichtungspolitik ein Vorbild für die Nazi-Wehrmacht im Zweiten Weltkrieg werden sollte, ist er-

sichtlich aus der Selbsteinschätzung, aus dem Stolz, die brutalsten Militäraktionen in der Weltgeschichte durchgeführt zu haben:

„Wenn man bei uns zu Hause so harmlos ist zu glauben, es wurde hier für christliche Kultur und Sitte Propaganda gemacht, so gibt das einmal arge Enttäuschung. Seit de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und den Raubzügen der Franzosen zur Zeit Ludwigs XIV. in Deutschland ist ähnliches an Verwüstungen noch nicht vorgekommen.“ (Tagebuch-

eintrag Waldersees, 12. Nov. 1900 in [15/S. 502])

Der deutsche Imperialismus hatte im Kern in seiner Politik und Aktion in China im kleinen bewiesen, was er wenige Jahre später in Afrika an den Hereros und anderen Völkern Namibias fortsetzte und steigerte und was nach 1939 zunehmend deutlich wurde: Extreme militaristische Brutalität, gepaart mit hemmungsloser Raub- und Mordlust, eine entfesselte Soldateska, die vor keinem Verbrechen zurückschreckt.

## Anhang

### **Anmerkung 1: Mao Tse-tung zur Geschichte der imperialistischen Ausbeutung und Unterdrückung Chinas**

Der Imperialismus unterdrückt im Komplott mit den feudalen Kräften Chinas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Kapitalismus.

Mit ihrem Eindringen in China verfolg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keineswegs das Ziel, das feudale China in ein kapitalistisches zu verwandeln. Im Gegenteil,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verfolgen das Ziel, China in ihre Halbkolonie und Kolonie zu verwandeln.

Zur Erreichung dieses Ziels wandten und wend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weiterhin alle militärischen,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Unterdrückungsmittel an, um China nach und nach in eine Halbkolonie und Kolonie zu verwandeln. Es handelt sich um folgende Unterdrückungsmittel:

(1) Sie führten gegen China viele Aggressionskriege, wie beispielsweise den von England angezettelten Opiumkrieg von 1840, den von den vereinten

Truppen Englands und Frankreichs entfesselten Krieg von 1857, den Chinesisch-Französischen Krieg von 1884, den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 von 1894 und den Krieg, den die verbündeten Streitkräfte der acht Mächte im Jahre 1900 führten. Nach den militärischen Niederlagen, die sie China beibrachten, bemächtigten sich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nicht nur vieler Länder, die rings um China lagen und ursprünglich unter seiner Schirmherrschaft gestanden hatten, sondern rissen auch Teile chinesischen Territoriums an sich oder „pachteten“ sie von China. Beispielsweise besetzte Japan Taiwan und die Penghu-Inseln und „pachtete“ Lüschn; England nahm sich Hongkong; Frankreich „pachtete“ die Guangdschou-Bucht. Außer der Abtrennung von Territorien forder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von China riesige Kontributionen. Auf diese Weise wurden China – diesem riesigen feudalen Imperium – schwere Schläge versetzt.

(2)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zwangen China eine Reihe von ungleichen Verträgen auf. Auf Grund dieser Verträge erwarben sie das Recht, Seestreitkräfte und Landtruppen in China zu stationieren, sowie das Recht der Konsulargerichtsbarkeit; auch teilten sie ganz China untereinander in Einflussphären auf.

(3) Auf Grund der ungleichen Verträge brach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alle wichtigen Handelshäfen Chinas unter ihre Kontrolle und verwandelten Teile des Territoriums vieler Handelshäfen in Konzessionen unter ihrer unmittelbaren Verwaltung. Sie übten die Kontrolle über Chinas Zollhoheit, Außenhandel und Verkehrswesen (See-, Land-, Binnenwasser- und Luftwege) aus. Dadurch erhielten sie die Möglichkeit, ihre Waren in großen Mengen abzusetzen, China in einen Markt für ihre Industrieerzeugnisse zu verwandeln und gleichzeitig die 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 Chinas den Bedürfnissen des Imperialismus unterzuordnen.

(4) Daneben unterhiel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in China viele Betriebe der Leicht- und der Schwerindustrie, um die chinesischen Rohstoffe und billigen Arbeitskräfte an Ort und Stelle zu exploitierten; sie übten damit einen direkten wirtschaftlichen Druck auf die chinesische nationale Industrie aus und verhinderten unmittelbar die Entwicklung der Produktivkräfte Chinas.

(5) Indem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Anleihen gewährten und in China Banken gründeten, monopolisierten sie den Geldmarkt und die Finanzen Chinas. Dadurch haben sie nicht nur in der Warenkonkurrenz den chinesischen natio-

nen Kapitalismus zu Boden gedrückt, sondern China auch auf dem Geldmarkt und im Finanzwesen an der Kehle gepackt.

(6) Um sich die Ausbeutung der breiten Massen der Bauern und anderer Schichten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zu erleichtern, hab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ein Netz der Ausbeutung durch Kompradorentum und Handelswucher über ganz China – von den Handelsstädten bis zu den entlegensten Winkeln – gespannt und die Klassen der Kompradoren und der kommerziellen Wucherer großgezogen, die in ihrem Dienst stehen.

(7) Neben der Kompradorenklasse verwandel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auch die feudale Grundherrenklasse in eine Stütze ihrer Herrschaft in China. Sie „verbündeten sich vor allem mit den herrschenden Schichten der früheren sozialen Ordnung – mit den Feudalen und der Handels- und Wucherbourgeoisie – gegen die Mehrheit des Volkes. Überall versucht der Imperialismus die vorkapitalistischen Formen der Ausbeutung (insbesondere auf dem Lande), die die Grundlage für die Existenz seiner reaktionären Bundesgenossen bilden, zu erhalten und zu verewigen.“ „... der Imperialismus“ ist „mit seiner gesamten finanziellen und militärischen Macht in China die Kraft ..., die die feudalen Überreste mit ihrem ganzen bürokratisch-militaristischen Überbau stützt, inspiriert, kultiviert und konserviert.“

(8) Um Kriegswirren unter den chinesischen Militärmachthabern zu entfachen und das chinesische Volk niederzuhalten, versorg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die reaktionären Regierungen Chinas mit großen Mengen

Waffen und Munition und stellten ihnen eine Horde von Militärberatern zur Verfügung.

(9) Neben all diesen Maßnahmen ließ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auch in ihren Anstrengungen zur geistigen Verdummung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nicht nach. Das ist ihre Aggressionspolitik auf dem Gebiet der Kultur. Diese Aggressionspolitik wird durch die Tätigkeit der Missionare, durch Gründung von Krankenhäusern und Lehranstalten, durch Herausgabe von Zeitungen und durch Gewinnung der chinesischen Jugend für das Studium im Ausland durchgeführt. Das alles wird getan, um gefügige Intellektuellenkader für die Imperialisten heranzubilden und die breiten Massen des chinesischen Volkes zu verdummern.

(10) Nach dem 18. September 1931 verwandelte sich ein bedeutender Teil des Territoriums Chinas, das bereits zur Halbkolonie geworden war, infolge des großangelegten Angriffs des japani-

schen Imperialismus in eine japanische Kolonie.

Diese eben geschilderten Tatsachen sind die andere Seite der neuen Veränderungen nach der Invasion des Imperialismus in China. Sie zeigen das mit Blut befleckte Bild der Umwandlung des feudalen China in ein halbfeudales, halbkoloniales und koloniales China.

Daraus ist ersichtlich, dass die Aggression der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gegen China einerseits den Zerfall der chinesischen Feudalgesell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von Elementen des Kapitalismus in China förderte und dadurch die feudale in eine halbfeudale Gesellschaft umwandelte; andererseits aber üb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hier eine grausame Herrschaft aus und verwandelten das unabhängige China in ein halbkoloniales und koloniales Land.

(Aus: Mao Tse-tung, „Die chinesische Revolution und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Chinas“, 1939, Ausgewählte Werke, Band II, Peking 1968, S. 360–362)

## **Anmerkung 2:**

### **Kiautschou – „Musterkoloni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Durch den sogenannten „Kiautschou-Vertrag“ vom 6. März 1898 wurde die 150.000 km<sup>2</sup> große Provinz Schantung in eine „deutsche Einflusszone“ umgewandelt.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wurde darin vertraglich verpflichtet, das Gebiet auf 99 Jahre an Deutschland zu „verpachten“. Außerdem erhielt Deutschland für alle Unternehmen in Schantung, zu denen ausländisches Kapital herangezogen wurde, das Recht einer bevorzugten Beteiligung sowie Eisenbahnkonzessionen und Bergwerksunternehmungen zugesprochen. Am 27. April erklärte Kaiser Wilhelm II. Kiautschou offiziell zum „Schutzge-

biet“ des deutschen Reiches. Der Knebelvertrag sicherte den deutschen Truppen freien Durchmarsch innerhalb einer festgelegten Zone und gab den deutschen Kolonialisten Mitspracherecht bei der Administration des Gebiets.

Schon drei Jahre zuvor hatten sich die deutschen Militaristen per Vertrag eine Konzession in Hankow erzwungen. Darin „überlies“ die chinesische Regierung den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auf ewig“ ein über 40 km<sup>2</sup> großes Gebiet in Hankow mit den damit verbundenen Vorrechten, u. a. Niederlassungsverbot für Chinesen und Überga-

be der Gerichtshoheit dieses Gebietes an Deutschland. China trat damit sowohl einen Teil seines Territoriums als auch seine Souveränität innerhalb dieses Gebietes an die deutsche Regierung ab.

(U.G. Fabritzek,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 1973, S. 21 / „Die Yihotuan-Bewegung von 1900“, Peking 1978, S. 5/6, 47 / P. Fleming, „Die Belagerung zu Peking“, Frankfurt/M. 1997, S. 347 / M. Leutner,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Berlin 1997, S. 241)

### **Anmerkung 3: Zwei besondere Aspekte der imperialistischen Eroberung und Ausbeutung Chinas**

#### **Die Missionare als eine Speerspitze der imperialistischen Aggression**

Mit besonderem und berechtigtem Hass verfolgten die revolutionären Kräfte in China die imperialistischen Missionare. Warum? Die Missionare hatten eine privilegierte Rechtsstellung und kauften sich als Anhängerschaft sogenannte „Reis-Christen“, also Konvertiten aus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Die sogenannten „christlichen Gemeinden“ standen unter dem Schutz der jeweiligen imperialistischen Macht und genossen eine privilegierte Rechtsposition. Das bedeutete, dass sie betrügen, ja rauben konnten, ohne dass sie dem chinesischen Recht unterstanden. Zudem traten die imperialistischen Missionare mit europäisch-chauvinistischer Arroganz die in der Bevölkerung existierenden religiösen Ideen, Vorstellungen und Bräuche mit Füßen. Oft genug zerstörten sie die Dorftempel, um in den Orten Kirchen zu errichten. In der Zeit von 1861 bis 1899 gab es allein 811 dokumentierte Fälle, in denen es zu sogenannten „Kirchenprozessen“ kam. [2/S. 32]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hatte genau erkannt, dass nicht „Nächstenliebe“ sondern imperialistische Ausbeutung und Unterdrückung der Kern der Missionarstätigkeit war. Unter den

deutschen Missionaren tat sich besonders brutal Johann Baptist Anzer hervor, seines Zeichens Bischof in der Mission in Schantung, die eine Art Speerspitze der imperialistischen Aggression war. Anzer galt als einer der aggressivsten Missionare in China, zugleich war er ein militanter deutscher Nationalist, der seine Kirchenpolitik eng mit den Expansionsplänen der deutschen Reichsregierung verknüpfte. Nach der militärischen Besetzung Schantungs wurde ein der Mission feindlich gegenüberstehender chinesischer Gouverneur abgesetzt. Anzer ließ sich schließlich sogar als Generalgouverneur ernennen, was nach chinesischem Recht eine Gleichstellung mit einem chinesischen Vizekönig bedeutete. [2/S. 32 f.]

#### **Dürren und Überschwemmungen – Folge der imperialistischen Ausplünderung und Korruption**

Der von den Imperialisten forcierte Eisenbahnbau – und damit einhergehend die Bestechung chinesischer zentraler und lokaler Machthaber – griffen massiv in das zentrale Bewässerungssystem, in Deichbau und Kanäle ein. Die Folge war, dass es – nur scheinbar durch die Natur selbst hervorgerufen – zu extremen Dürren und Überschwemmungen kam, die die Lebens-

grundlage der Bevölkerung vernichteten.

Seit 1855 war die ökologische Instabilität und Anfälligkeit für Katastrophen in Schantung durch die Flussbettverlagerung des Gelben Flusses festzustellen. Überschwemmungen und Dürrekatastrophen häuften sich, die Ernterträge der Masse der Bauern wurden vernichtet. Verschlimmert wurde die Situation noch dadurch, dass die einheimischen reaktionären Machthaber, die Beamten der zentralen und lokalen Behörden, die Gelder für die Instandhaltung der Dämme des Gelben Flusses häufig in die eigene Tasche „umleiten“, so dass es immer wieder zu Damnbrüchen kam. In den Jahren 1897–1898 befanden sich die meisten Flussregulierungsanlagen in einem desolaten Zustand (siehe [2/S. 36] und [1]).

Die imperialistische Propaganda, die einerseits die „Christenfeindlichkeit“ der chinesisch-revolutionären Bewegung meinte anprangern zu können, versuchte andererseits di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als dumm und verblödet zu diffamieren, indem sie ihnen unterstellte, dass die Imperialisten mit mystischen Argumenten für die Dürre- und Überschwemmungskatastrophen verantwortlich gemacht würden.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hatten sich ein „Mitspracherecht“ insbesondere in Fragen der Flussregulierung im „Kiautschou-Vertrag“ vorbehalten. Der Eisenbahnbau drohte lebenswichtige Bewässerungssysteme der chinesischen Dörfer im Hinterland der „Musterkolonie“ zu zerstören. Dies bestätigte sich im Sommer 1902 nach dem Eisenbahnbau in Schantung im Gebiet der Stadt Gaomi. Vier Tage anhaltende starke Regenfälle im Juli genügten, um eine schwere Überschwemmung hervorzurufen, in deren Verlauf zahllose Dörfer zerstört und Felder überflutet wurden. In einem Geheimbericht stellte ein deutscher Marine-Ingenieur fest, dass diese „Überschwemmungen zweifelsfrei durch den Eisenbahnbau verursacht“ worden waren. [15/S. 241 f.]

#### **Anmerkung 4: Die chauvinistisch-militaristische Hetze und die „Hunnenrede“ Kaiser Wilhelms II.**

Mit dem Tod ihres Gesandten Ketteler am 20. Juni 1900 hatten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einen Vorwand, Truppenkontingente in großer Zahl nach China zu schicken, um endlich die Widerstandsbewegung zerschlagen und ihre kolonialen Besitztümer ausweiten zu können. In den Reden des deutschen Kaisers sticht neben dem Chauvinismus besonders der Militarismus deutsch-preußischer Prägung hervor.

Schon zwei Tage vor der tatsächlichen Hinrichtung Kettelers wurde die

Meldung von seinem Tod gebracht. Kaiser Wilhelm II. kündigte sofort am 19. Juni 1900 in einem Brief an seinen Staatssekretär Bülow an: „Peking ... muss dem Erdboden gleich gemacht werden.“ [11/S. 55] Als die ersten beiden „Strafbataillone“ ausliefen, gab er den deutschen Soldaten mit auf den Weg: „Die deutsche Fahne ist beleidigt worden ... Das verlangt exemplarische Bestrafung und Rache.“ Nach einer anderen Version dieser Rede, die ganz im Sinne der drei Wochen später gehaltenen

nen „Hunnenrede“ abgefasst ist, soll er schon hier das Ausmaß der „Strafexpeditionen“ offen angekündigt haben:

„Ich hoffe Rache zu nehmen, wie sie die Welt noch nicht gesehen hat.“ [8]

Welche Wirkung diese Reden hatten, wird in einem Brief eines Teilnehmers der „Strafexpeditionen“ deutlich:

„Als im Sommer 1900 durch das Wort des Kaisers Freiwillige aufgerufen wurden, um in Ostasien für die verletzte deutsche Ehre einzutreten, da meldeten sich freudig viele Tausende, welche ihr Pflichtgefühl und die Sehnsucht nach Taten ... hinaustrieben.“ [11/S. 222 f.]

Als dann weitere Kriegsschiffe von Bremerhaven aus am 27. Juli in See stachen, hielt Wilhelm II. eine Rede, die als berüchtigte „Hunnenrede“ in die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eingehen sollte. Der deutsche Kaiser führte der Welt vor Augen, welche Mission der deutsche Militarismus bei seinem ersten großen militärischen Auftreten im Kampf um die Kolonien zu erfüllen gedachte: ein Denkmal an Brutalität und Rücksichtslosigkeit für „1.000 Jahre ... in die Geschichte Chinas einbrennen“.

Der Kaiser schwor die deutschen Soldaten mit seiner Rede auf den Vernichtungsfeldzug ein. Es sollten „keine Gefangenen“ gemacht werden und kein Chinese sollte es mehr wagen, „einen Deutschen nur scheel anzusehen“. Veröffentlicht werden sollte die Rede jedoch nur in einer „entschärften“ Version. Die deutsch-preußische Regierung hatte wieder einmal die Presse zensiert, alle – fast alle – Journalisten druckten nur die „entschärfte“ Fassung der „Hunnenrede“ ab.

Aber der „Nordwestdeutschen Zeitung“, einem kleinen Lokalblatt aus Bremerhaven, gelang es, die Rede in vollem Wortlaut abzudrucken. Ihr Reporter hatte abseits der bekannten Journalisten auf einem Hausdach gegessen und die Ansprache mitstenographiert. Von den preußischen Zensurbeamten offensichtlich übersehen, hatte der Redakteur eine „große Story“ gewittert und schnell veranlasst, dass Tausende von Exemplaren in andere Städte geschickt und veröffentlicht wurden. Die Zensurbehörden kamen zu spät. [6]

Die unzensierte Rede Kaiser Wilhelms II. vom 27. Juli 1900 lautet wie folgt:

„Große überseeische Aufgaben sind es, die dem neu entstandenen Deutschen Reiche zugefallen sind. Aufgaben weit größer, als viele meiner Landsleute es erwartet haben. Das Deutsche Reich hat seinem Charakter nach die Verpflichtung, seinen Bürgern, sofern diese im Ausland bedrängt werden, beizustehen. Die Aufgaben, welche das alte Römische Reich Deutscher Nation nicht hat lösen können, ist das neue Deutsche Reich in der Lage zu lösen. Das Mittel, das ihm dies ermöglicht, ist unser Heer ... Eine große Aufgabe harret eurer; ihr sollt das schwere Unrecht, das geschehen ist, sühnen. Die Chinesen haben das Völkerrecht umgeworfen, sie haben in einer in der Weltgeschichte nicht erhörten Weise der Heiligkeit des Gesandten, den Pflichten des Gastrechts hohn gesprochen. Es ist das um so empörender, als dieses Verbrechen begangen worden ist von einer Nation, die auf ihre uralte Kultur stolz ist. Bewahrt die alte preußische Tüchtigkeit, zeigt euch



als Christen im freudigen Ertragen von Leiden, mögen Ehre und Ruhm euren Fahnen und Waffen folgen, gebt an Manneszucht und Disziplin aller Welt ein Beispiel ...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Wie vor tausend Jahren die Hunnen unter König Etzel sich einen Namen gemacht haben, der sie noch jetzt in Überlieferung und Märchen gewal-*

*tig erscheinen lässt, so muss der Name „Deutscher“ in China auf tausend Jahre durch euch in einer Weise bestätigt werden, dass niemals wieder ein Chinese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auch nur scheinbar anzusehen.*

Wahrt Manneszucht. Der Segen Gottes sei mit euch, die Gebete eines ganzen Volkes, meine Wünsche begleiten euch, jeden einzelnen. Öffnet der Kultur den Weg ein für allemal! Nun könnt ihr reisen! Adieu Kameraden!“ [11/S. 221 f.]

### **Anmerkung 5: Lenins Artikel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 Eroberung Chinas in der ersten Ausgabe der „Iskra“**

Für die Bolschewiki in Russland war der Raubzug der Imperialisten von einer solchen weltpolitischen Bedeutung, dass Lenin in der ersten Ausgabe der „Iskra“ vom Dezember 1900 in dem Artikel „Der China-Krieg“ Anklage gegen diese imperialistische Eroberung erhob und entlarvte, wie schleichend die Imperialisten damit begonnen hatten, China unter sich aufzuteilen. Als diese schleichende Aufteilung durch den Widerstand der Volksmassen Chinas schließlich „gestört“ wurde, gingen sie in ein kriegerisches Gemetzel über. Eindringlich prangerte er die Verbrechen der imperialistischen Mächte und die heuchlerisch-verlogenen Phrasen an, mit denen sie diese Verbrechen zu rechtfertigen suchten:

**„Eine nach der anderen gingen die europäischen Regierungen so eifrig daran, chinesisches Land zu rauben, ‚zu pachten‘, wie man es nennt, dass nicht ohne Grund von einer Aufteilung Chinas gesprochen wird. Will man die Dinge bei**

**ihrem richtigen Namen nennen, so muss man sagen, dass die europäischen Regierungen (und die russische ist dabei so ziemlich eine der ersten) mit der Aufteilung Chinas bereits begonnen haben. Aber sie haben mit der Aufteilung nicht offen begonnen, sondern heimlich, wie Diebe. Sie sind drangegangen, China auszurauben, wie man einen Leichnam ausraubt, und als dieser vermeintliche Tote Widerstand zu leisten versuchte, fielen sie wie wilde Tiere über ihn her, indem sie ganze Dörfer niederbrannten, wehrlose Einwohner, Frauen und Kinder im Amur ertränkten, niederschossen und auf die Bajonette spießten. Und all diese christlichen Heldenataren werden begleitet von Geschrei gegen die chinesischen Barbaren, die es wagten ihre Hand gegen zivilisierte Europäer zu erheben.“**

(Lenin, „Der China-Krieg“, 1900, Werke Band 4, S. 373)

Lenin führte auch einen Kampf gegen die chauvinistische Hetze von der sogenannten „gelben Gefahr“, die nicht nur in Russland, sondern in allen imperialistischen Ländern betrieben wurde:

„Wodurch nun wurde der Überfall der Chinesen auf die Europäer veranlasst, dieser Aufruhr, der von den Engländern, Franzosen, Deutschen, Russen, Japanern usw. mit so viel Eifer unterdrückt wird? ‚Durch die Feindschaft der gelben Rasse gegen die weiße Rasse‘, ‚durch den Hass der Chinesen gegen die europäische Kultur und Zivilisation‘ – versichern die Fürsprecher des Krieges. Ja, die Chinesen hassen tatsächlich die Europäer, aber welche Europäer hassen sie und weshalb? Die Chinesen hassen nicht die Völker Europas – mit ihnen haben sie keine Zusam-

menstöße gehabt –, sondern die europäischen Kapitalisten und die den Kapitalisten hörigen europäischen Regierungen. Wie sollten auch die Chinesen nicht Menschen hassen, die nur des Profits wegen nach China gekommen sind, die ihre vielgerühmte Zivilisation nur zu Betrug, Raub und Vergewaltigung ausgenutzt haben, die gegen China Kriege führten, um das Recht zu erhalten, mit dem das Volk betäubenden Opium Handel zu treiben (der Krieg Englands und Frankreichs gegen China im Jahre 1856), die ihre Raubpolitik heuchlerisch mit der Verbreitung des Christentums verschleierten? Diese Raubpolitik betreiben die bürgerlichen Regierungen Europas schon lange gegen China ...“

(Ebenda, S. 372)

### **Anmerkung 6: Zum Kampf der revolutionären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gegen die Aggressionspolitik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China**

Deutlich und unüberhörbar hat die revolutionäre Sozialdemokratie im Jahre 1900 die Expansion und die barbarische Massakrierung der aufständischen Yihotuan-Bewegung und der chinesischen Bevölkerung durch deutsche Soldaten verurteilt. Auch bei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Schwankungen und Fehler und dem unverkennbaren Auftauchen der Revisionisten um Bernstein und Co. war sie im großen und ganzen die einzige Kraft, die wirklich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 Aggression in China auftrat, in Protestveranstaltungen, aber auch in den Parlamentsreden im Reichstag. Auf sozialdemokratischen Konferenzen (z. B. auf der 1. Konfe-

renz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Frauen am 15.–16. September) und dem Parteitag im September 1900 wurde gegen die Eroberungs- und Unterdrückungspolitik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Stellung genommen.

Die Vertreter der revolutionären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prangerten die Verbrechen der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an und führten eine leidenschaftliche Anklagekampagne in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resse durch. Sie veröffentlichten die sogenannten „Hunnenbriefe“, in denen Soldaten über die verübten Grausamkeiten nach dem niedergeschlagenen Aufstand mit Stolz berichteten.

Gegen die Redakteure von sozialdemokratischen Zeitungen in Stuttgart, Frankfurt, Berlin strengten die preußischen Militärs Anfang November 1901 ein Gerichtsverfahren an, in dessen Verlauf einige Redakteure zu Gefängnisstrafen verurteilt wurden. (Vgl. „Vorwärts“ vom 5. Dez. 1901 in [3/ S. 580, FN 42])

August Bebel charakterisierte die Kolonialpolitik Deutschlands richtig als Ausdruck des „Geistes des Absolutismus ... Geistes des Imperialismus“. [3/ S. 555] Im Reichstag prangerte er an, dass die Imperialisten

„alle daraufhin (arbeiten), das große chinesische Reich in die vollständige Abhängigkeit von den auswärtigen Mächten zu bringen ...“ [18/ S. 207]

Der im September 1900 in Mainz stattfindende Parteitag stellte in einer Resolution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 Aggressionspolitik fest:

„Die Sozialdemokratie als Feindin jeder Unterdrückung und Ausbeutung von Menschen durch Menschen erhebt gegen diese Raub- und Eroberungspolitik den entschiedensten Widerspruch. Sie verlangt, dass die wünschenswerten und erforderlichen Kultur- und Verkehrsbeziehungen zu allen Völkern der Erde dadurch verwirklicht werden, dass die Rechte, die Freiheiten sowie die Unabhängigkeit dieser Völkerschaften geachtet und gewahrt werden.“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s Parteitags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17. bis 21. September 1900, in [9/S. 52])

Heute wieder höchstaktuell ist Rosa Luxemburgs Kampf gegen den europä-

ischen Chauvinismus und die Propagierung des proletarischen Internationalismus:

„Nicht die europäische Solidarität, sondern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die sämtliche Weltteile, Rassen<sup>1</sup> und Völker umfasst, ist der Grundpfeiler des Sozialismus im Marx-schen Sinne. Jede Teilsolidarität aber ist nicht eine Stufe zur Verwirklichung der echten Internationalität, sondern ihr Gegensatz, ihr Feind, eine Zweideutigkeit, unter der der Pferdefuß des nationalen Antagonismus hervorguckt. Ebenso wie wir stets den Pangermanismus, den Panslawismus, den Panamerikanismus als reaktionäre Ideen bekämpfen, ebenso haben wir mit der Idee des Paneuropäertums nicht das geringste zu schaffen.“

(Rosa Luxemburg, „Friedensutopien“, 1911, Gesammelte Werke, Band 2, Berlin 1986, S. 503)

In der „Neuen Zeit“ ging Mehring am 20. Juni 1900, dem Tag der Hinrichtung Kettlers durch die chinesische Aufstandsbewegung, auch auf die Frage ein, wozu der deutsche Imperialismus die räuberischen Kolonialkriege benutzt. Er erklärte:

„... jeder Arbeiter, der an dem Joche schmieden hülfe, das den Chinesen auf den Nacken gelegt werden soll, würde nur seine eigenen Ketten fester schmieden.“ [Zitiert nach 9/ S. 40]

Rosa Luxemburg kämpfte auf dem Internationalen Sozialistenkongress in Paris im September 1900 für die Verabschiedung einer Resolution gegen die Kolonialpolitik. Sie forderte:

„... dass es nötig ist, dass die Arbeiterpartei in jedem Lande mit ver-

doppelter Wucht und Energie gegen Militar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 auftrete (...) dass die sozialistischen Vertreter in allen Parlamenten unbedingt gegen jede Ausgabe des Militarismus, Marinismus oder der Kolonalexpeditionen zu stimmen verpflichtet sind.“

(Rosa Luxemburg, „Internationaler Sozialistenkongress vom 23. bis 27. September in Paris“, Gesammelte Werke, Band 1, 1. Halbband, S. 808, FN 1)

\* \* \*

In den Reihe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entwickelte sich eine heftige Polemik über die Bedeutung und Einschätzung der Protestaktionen gegen die imperialistische Aggressionspolitik. Eine herausragende Rolle dabei spielte die Kritik Rosa Luxemburgs:

„Der chinesische Krieg ist das erste Ereignis der weltpolitischen Ära, in das alle Kulturstaaten verwickelt sind, und dieser erste Vorstoß der internationalen Reaktion, der Heiligen Allianz, hätte sofort durch eine Protest der vereinigten Arbeiterparteien Europas beantwortet werden müssen.“

(Rosa Luxemburg, „Parteitag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vom 17. bis 21. September 1900 in Mainz“, Gesammelte Werke, Band 1, 1. Halbband, S. 801)

Richtig forderte sie von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

„Die Initiative darin hätte gewiss die Partei nehmen müssen, deren Land im Kriege gegen China die führende Rolle hat.“

(Ebenda)

Konkret kritisierte Rosa Luxemburg, dass

„keine planmäßige Agitation durch Protestversammlungen eingeleitet worden (waren).“ (Ebenda, S. 800)

Außenstehende, so fährt sie fort, könnten den falschen Eindruck gewinnen

„als ob unsere Partei, die doch in allen Fällen so interessante Protestbewegungen entfaltet hat, hier, wo es sich um einen blutigen Krieg des vereinigten kapitalistischen Europas gegen Asien handelt, sich so ruhig verhält, weil sie auf den offiziellen und nichtoffiziellen Chauvinismus zu viel Rücksicht nimmt, das wäre für uns natürlich fatal.“

(Ebenda)

Selbstkritisch stellte Rosa Luxemburg fest:

„... es kam darauf an, in allen Ländern die gleichgültigen Volksmassen aufzurütteln, und in dieser Beziehung fürchte ich sehr, dass unsere Partei nicht nur im eignen Land sich eine Unterlassung hat zuschulden kommen lassen, sondern auch in bezug auf die internationale Solidarität.“ (Ebenda, S. 801)

Diese Polemik Rosa Luxemburgs richtete sich gegen die offen opportunistisch-chauvinistischen Positionen innerhalb der Sozialdemokratie, wie sie beispielsweise von Kautsky vertreten wurden. Obgleich es bei ihm bereits Anzeichen seiner späteren revisionistischen Entwicklung gab, war er zu diesem Zeitpunkt noch nicht vollständig ins opportunistisch-revisionistische Lager der Konterrevolution gewechselt. Kautsky lehnte es in europäisch-chauvinistischer Manier nachdrücklich ab, dass „Kämpfe der Wilden gegen die Zivilisation unsere Kämpfe sind.“ (Neue Zeit, 19. Jahrgang, 1. Band, 1900/1901, zitiert in [20/S. 163]). Die angebliche „Ausweglosigkeit“ der Kämpfe der Kolonialvölker vorschiebend, erklärte er:

„So sehr wir solche Rebellionen be- greifen und so sehr wir mit den Re- bellen fühlen, sie fördern kann die Sozialdemokratie nicht, ebenso we- nig wie sie aussichtslose Putsche des Proletariats in Europa selbst fördert.“ [20/S. 163]

## Ein unverzeihlicher Fehler Bebels

So klar und eindeutig Bebel die imperi- alistische Aggression der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ablehnte und bekämpfte, so entscheidend er dazu beitrug, dass über die Gräu- el der deutschen Koloni- alarmee in Deutschland berichtet und die „Hunnenbriefe“ als Anklage gegen den deutschen Militarismus veröffent- licht wurden, um so unverzeihlicher ist seine Haltung zu der verdienten Er- schießung des deutschen Gesandten Ketteler durch die chinesische Wider- standsbewegung. Er erklärte im Reichstag am 10. November 1900:

„Nun, meine Herren, das war ein Verbrechen, das war genau ein Verbrechen, wie die Mordtaten unse- rer Soldaten vorher, darin ist kein Unterschied. Aber ich sage gerade heraus: Das dieses Verbrechen gegen den deutschen Gesandten ver- übt wurde, war die Folge des unge- heuren Rachegefühls, des höchsten Maßes der Empörung, das die Mas- se der Bevölkerung in Peking erfassen musste nach den Ereignissen, die ich Ihnen eben vorgetragen habe und die sich vor dem 20. Juni zuge-

tragen haben. Unter allen Umstän- den war der Mord des Gesandten ein Verbrechen – ich spreche das Wort ungeniert aus – wo mildernde Umstände vorlagen. (Sehr richtig! bei den Sozialdemokraten.)“ [Zitiert nach 18/S. 208]

Dagegen wurde die Erschießung des in ganz Peking berüchtigten deutschen Gesandten Baron von Ketteler durch den Gefreiten der chinesischen Armee En Hai von den chinesischen Revoluti- onären begrüßt. Bebel kannte die Rolle nicht nur der Militärs, sondern auch der „Zivilisten“ und Missionare für die deutschen Imperialisten. Sie gemein- sam betrieben die Ausbeutung und Ausplünderung Chinas und waren dafür zur Rechenschaft zu ziehen. Dass Ket- teler darüber hinaus noch ein besonders berüchtigter Mordgeselle dieser „Her- renmenschen“ war, auch das war Bebel bekannt. Das Fatale an der Rede Bebels ist die Umkehrung von Täter und Opfer und zwar in dem Moment, in dem der Täter von den Opfern zur Rechenschaft gezogen wird und seine gerechte Strafe erhält. Bebels Distanzierung gibt dem bürgerlichen Druck nach.

<sup>1</sup> Marx spricht in der I. Internationale nicht von „Rasse“, sondern richtiger von Haut- farbe: „... ohne Rücksicht auf Farbe, Glaube, Nationalität oder Geschlecht ...“ (Marx, „Allgemeine Statuten und Verwal- tungs-Verordnungen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assoziation“, 1871, Marx/Engels Werke Band 17, S. 441)

## Quellen

- [1] Amelung, I., „Gegen die ausländischen Barbaren: Die ‚Boxer‘ und ihr Mythos“, [www.dhm.de/ausstellungen/tsingtau/katalog](http://www.dhm.de/ausstellungen/tsingtau/katalog)
- [2] Dabringhaus, S., „Der Boxer-Aufstand in China“, Hagen 1992
- [3] 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rsg.), „Marxismus und deutsche Arbeiterbewegung“, Berlin 1970
- [4] „Deutschland in China. 1900–1901. Bearbeitet von Teilnehmern an der Expedition, illustriert von Schlachtenmaler Rocholl, mit Beiträgen von Adolph Obst und anderen“, Düsseldorf 1902
- [5] Felber, R.,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in: *junge Welt*, 20.6.2000
- [6] Fesser, G.,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in: *Die Zeit*, 27.7.2000
- [7] Fleming, P., „Die Belagerung zu Peking“, Frankfurt/M. 1997
- [8] Frankfurter Rundschau, 30.6.2000
- [9] Institut für Marxismus-Leninismus der SED (Hrsg.),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Band 4, März 1898–Juli 1914“, Berlin 1967
- [10] Jermaschow, L., „Morgenröte über Asien“, Berlin 1951
- [11] Kieser, E., „Als China erwachte. Der Boxeraufstand“, Esslingen, München 1984
- [12] Klein, F., „Über die Verfälschung der historischen Wahrheit in der Aktenpublikation ‚Die groß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7. Jg., Heft 2, Berlin 1959
- [13] Kollektiv für die Serie „Geschichte des modernen China“ (Hrsg.), „Die Yihotuan-Bewegung von 1900“, Peking 1978
- [14] Kolonko, P., „Nachwort“, in: Fleming, P., „Die Belagerung zu Peking“, Frankfurt/M. 1997
- [15] Leutner, M., „Musterkolonie Kiautschou: Die Expans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in China“, Berlin 1997
- [16] Meisner, H. O., „Denkwürdigkeit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Alfred Grafen von Waldersee“, Band 3, Stuttgart-Berlin 1923
- [17] O’Connor, R., „Der Boxeraufstand. Gewalt und Tragödie“, München 1980
- [18] Petschul, J., Höpker, T., „Der Wahnsinn vom Weltreich. Di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en“, Hamburg 1986
- [19] Simpson, B., in: O’Connor, R., „Der Boxeraufstand. Gewalt und Tragödie“, München 1980
- [20] Schröder, H.-C., „Sozi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Bonn-Bad Godesberg 1975



# Rote Hefte

- Heft 1 Marx / Engels: 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 Heft 2 Warum die revisionistische Theorie vom friedlichen Weg zum Sozialismus grundfalsch ist
- Heft 3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atzer: Neapel, September 1943
- Heft 4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atzer: Prag, Mai 1945
- Heft 5 Über den bewaffneten Aufstand gegen die nazi-faschistischen Besatzer: Paris, August 1944
- Heft 6 Der revisionistische XX. Parteitag der KPdSU 1956
- Heft 7 Grundlegende Merkmale der 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
- Heft 8 Marx: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Lenin: Die Lehren des Moskauer Aufstandes
- Heft 9 Rosa Luxemburg, Karl Liebknecht und die revolutionäre KPD (1918)
- Heft 10 Der Aufruf des ZK der KPD vom 11. Juni 1945
- Heft 11 50 Jahre Bundeswehr - Die Zukunftspläne des deutschen Militärs: Krieg
- Heft 12 Religion - Opium des Volkes, Opium für das Volk
- Heft 13 Kampf um das revolutionäre Erbe Ernesto Che Guevaras
- Heft 14 70 Jahre Spanischer Bürgerkrieg - Die Bedeutung des bewaffneten Kampfes der Völker Spaniens gegen Faschismus und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 Heft 15 Die Bombardierung Dresdens - Ein Prüfstein für die korrekte Haltung gegen Nazismus und Nationalismus
- Heft 16 Zur Einschätzung Mao Tse-tungs
- Heft 17 Die Verbrechen der Nazis und der Nürnberger Prozess
- Heft 18 Zur Linie der KPD von 1929 bis 1933
- Heft 19 Die Nazi-Ideologie vom „lebensunwerten Leben“  
Von der Diskriminierung bis zum Massenmord
- Heft 20 Kommunistische Positionen gegen die Diskriminierung und Verfolgung Homosexueller
- Heft 21 Zum Kampf gegen den Antiziganismus - Der Nazi-Völkermord an den Sinti und Roma im besetzten Europa und der Antiziganismus in Deutschland heute
- Heft 22 Zum Kampf gegen den Antisemitismus (Teil I)  
Vor aller Augen: Das Novemberpogrom 1938

---

# Texte zu Deutschland und dem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



Autorenkollektiv

## **Die Verbrec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m Ersten Weltkrieg**

In diesem Buch werden die Verbrec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m imperialistischen Weltkrieg 1914 – 1918 zusammengestellt. Der Verlauf des Ersten Weltkrieges und seiner Vorgeschichte – einschließlich der antimilitaristischen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 wird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internationalen Lage und der Situation aller imperialistischen Großmächte dargestellt. Ausführlich werden auch Parallelen mit der heutigen sich zuspitzenden internationalen Lage thematisiert.

150 Seiten, Offenbach 2004, 8€  
ISBN 978-3-932636-92-9

Georgi Dimitroff

## **Gegen den Nazifaschismus**

Die Herausarbeitung des Klassencharakters des Faschismus wird in den Reden von Dimitroff vor dem VII. Weltkongress der Kommunistischen Internationale verknüpft mit einer Analyse von Besonderheiten des Nazifaschismus; es geht um die Aufgaben der antifaschistischen Einheits- und Volksfront, die Dimitroff im Zusammenhang mit einer Kritik an taktischen Fehlern der KPD im Kampf gegen die Nazis erläutert.

371 Seiten, Offenbach 2002, 20€  
ISBN 978-3-932636-25-7

